



# 共产主义者

◀月刊第8期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2025.12

## 时事

高市早苗引起  
的外交风波：  
民族国家、外  
交与资本

## 理论

“马列毛大群”  
在为谁的  
利益服务？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http://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mailto:Leninists1917@proton.me)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世界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国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双手开拓的更美好的世界！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mailto:Leninists1917@proton.me)

# 我们是谁

官方网站：  
[bolshhevikleninists.com](http://bolshhevikleninists.com)



# 《共产主义者》

官方YOUTUBE中文播客

- 总结历史
- 学习理论
- 时事评析
- 文艺评论
- 组织建设
- 政治/生活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 时事

I	佐赫兰·马姆达尼胜选：“民主社会主义”何去何从	05
II	巴西警察突袭贫民窟：“地下红军”夺权为什么只能是空想	09
III	海南琼中农运	15
IV	香港火灾——十一分人祸	21
V	高市早苗引起的外交风波：民族国家、外交与资本	27

37	马列毛大群的百篇骂战：歇斯底里与霸权狂热	VI
46	经典导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VII
53	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	VIII
60	民主集中制的主观条件	IX
64	停止那教师爷般的颐指气使！	X
68	“马列毛大群”在为谁的利益服务？	XI
74	论阶级社会中的科学研究	XII
78	“马列毛大群”工人工作路线的进化史	XIII

# 理论

# 佐赫兰·马姆达尼胜选：“民主社会主义”何去何从

作者：成梦



近日，一则有趣的新闻在境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度颇高的讨论：34岁的佐赫兰·马姆达尼以50.39%的得票率赢得了2025年纽约市市长选举，这意味着他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心脏得到了超过一百万选民的支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热度往往出于大多数中国网民的朴素的认知，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的美国，在美国的心脏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当选市长将会是有利于中国的全球反帝事业的好事，这确实为佐赫兰吸引了一大批中国“社会主义接班人”隔空表达支持。抛开这种很幼稚的认识不谈，佐赫兰的当选的确确是社会主义的一场胜利，它清晰无疑地表明，在看似繁荣的表面下始终燃烧着不满的火焰，而接过十年前的桑德斯的接力棒的社会主义理念，终究能在风起云涌的世界局势下缓慢激进化的群众意识中取得更多明确的支持：属于劳动人民的纲领是能够取得胜利的。

## “民主社会主义”……

佐赫兰主张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纽约人征收统一税率2%的附加税，并提出了多项房屋政策，这包括冻结租金稳定单位租金升幅、大规模兴建及翻新公营房

屋、加强对业主的监管等，更引人关注的政策还有废除公交车车费和在每个行政区由市政府营运一家杂货店以降低食品杂货价格等。这样的措施无疑给被生活成本几乎无止境的增长、越发奉行保守主义的联邦政府、巴以局势在美国政府的倒行逆施下愈发滑向人道主义的惨痛悲剧等等点燃了长久以来的不满的纽约市民带来了一缕希望，以至于本次选举的投票率已经创下了1969年以来的记录，甚至在一部分地区逼近了总统大选的规模。



佐赫兰·马姆达尼的选举造势现场

人民群众的这种热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经历了长久以来垄断了左翼话语权的民主党带来的长期积压的自由主义垃圾之上，以拯救者的形象展现在美国人民面前的唐纳德·特朗普最终带来的只是另一场更深的失望。压制少数群体权益、逆全球化和近乎癫狂的关税政策使得人民彻底看清了这个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投机行为和通过玩弄群众对当局的不满并借此攫取权力的嘴脸。民众开始以比当年更大的接受度寻求更左翼的方案，正如他们面对特朗普当时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竞选“承诺”时一样，“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标签及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集体志愿行动很快出现在了他们眼前，一位崭新的承诺为他们而战的反建制政治家就这么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美国工薪阶层在破产的自由主义民主党和自绝于群众的保守主义共和党之外的替代性选择。

的确，这场群众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在短期内毫无疑问会重新引发许多人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并尝试去了解它，这意味着工人阶级试图对现状进行反击的愿望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表达，而左翼的力量在这一时期内则有可能趁势取得更大的宣传乃至教育的成果。但是对于工人阶级本身来说，这样一场胜利远远没有达到足以庆贺的地步，这一点从他最初选择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开始就已经有所体现。有趣的是，或许是响应民主党对自己已经被佐赫兰这个“共产主义者”染红的否认，《每日秀》采访了美国共产党（CPUSA）的联合主席与其《人民世界》报的联合编辑乔·西姆斯，并借着这个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无害花瓶的历史遗留物之口软弱地且肤浅地道出了“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即使佐赫兰和民主党内建制派的分歧可以

被其主要竞争对手安德鲁·科莫形象地形容为“一场内战”，只要后者在费尽心思和金钱试图在造势上击败他的策略被证明无效后，民主党整体就将倾向于易边与他达成合作，在自己的官方网站首页表达出对其胜选的庆贺，自豪地宣布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而非数个个人的胜利，“从纽约市到乔治亚”。而在此合作之下，立场和姿态的缓和化则是马姆达尼必将承受的代价。

任何试图在工人阶级表达不满和改变现状的诉求面前保住钱袋子的既得利益者都会惊喜地发现，佐赫兰，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很快就对向他抛出橄榄枝的建制派、资本家和其他具有影响力（换言之，权势）的人士报以了琼瑶。

## ... 还是革命共产主义？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一份子，佐赫兰通过街头造势、志愿者扩散传单和 Instagram 短视频的选举策略成为了这一制度中的优胜者。但是明确的现实是讲述自己心中纽约最好的咖啡店也许可以帮他打造人设、赢得选举，但通过传播零散信息和许诺空头支票的方式是无法守住胜利果实的。因此，妥协与退让变成了其市政纲领背后的主旋律。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游行活动

7月，佐赫兰与纽约市合作联盟——代表着金融巨头、资本家和旧官僚的势力的利益——会面，而11月5日，后者就发布了热情洋溢的声明以“祝贺佐赫兰·马姆达尼当选市长”，他们还声明“赞同他充满希望的愿景，并期待与他携手合作”。事情清晰而明了。这场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在对旧势力的无下限的妥协下达成的，工人阶级的诉求不仅没有通过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而是依附于民主党才得以表达，这个诉求甚至都没有保持完整地撑到开始实施的那一天。毫无疑问，佐赫兰已经展露出了与资产阶级政客越发走近的愿望，他已经走上了背弃自己的支持基础即工人阶级的道路。佐赫兰很有可能倾向于在未来装出痛苦但不得不抛弃工人的样子，就像他在自己的胜选演讲中所说，自己“远非完美”，并且是在“尽力让自己

显得成熟”，这种犹豫懦弱的论调无疑会给他以后背叛自己承诺留下充足的回旋空间。佐赫兰已经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人尽可夫且乐于倾听与“学习”的傀儡，正如他演说的措辞一样，从“提高阶级意识”以“确保我们对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毫不含糊”到将自己的愿景描述为“包括亿万富翁在内的所有人都能乐在其中并受益”。

留在民主党的框架内并与资本和金融妥协将会严重地损害一切一开始尚且具备战斗性的工人的纲领，为了赢得选举，佐赫兰已经付出了过多的让步，包括容纳建制派人士支持自己的选举，甚至希望政府接收“来自不同意识形态”的、经验丰富的人才。这一切最终只会导向对工人阶级的背叛。为了真正地维护革命的斗争的纲领，一个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完全独立的群众性革命党是必要的。列宁就曾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中尖锐地指出：

“社会民主主义者指出某些反政府集团与工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时，始终都把工人划分出来，始终都解释这种支持的暂时性与相对性，始终都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因为它可能在明天就成为今天同盟者的敌人。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指出这点，就会减弱现在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我们回答说：指出这点，只会加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只有那些明白认识了一定阶级的实际利益的战士，才是强而有力的；凡是把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起着主要作用的阶级利益蒙蔽起来，都只会削弱战士的力量。”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永远是丝毫不留情面的对立。不是在工人政权下走向社会主义，就会是在资本主义的混乱中走向野蛮。历史上曾无数次出现本可以由工人掌握的政权最终却由于左翼的软弱而滑落回阶级调和的改良路线甚至倒退回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而佐赫兰的软弱治理或一次次在议会中的失败将会使得再次出现这样的悲剧变得可能，即群众将惊讶地发现社会主义也不过如此、社会主义也只是资本主义的改良或者社会主义与民主本身就是水火不容……这种将社会主义消解为一套不痛不痒的理论与实践的行为和斯大林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恐怖和专制的代名词起到的效果一样恶劣。就如同民主党人将进步、自由、民主和左翼等观念与自己捆绑起来一样，佐赫兰个人所持有的标签也通过选举被发展为了对所谓社会主义路线的定义。

当今的美国正以自己迈向腐朽的身躯愈发证明着托洛茨基此前的判断：“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经济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则是深陷在矛盾和危机当中的。”制造业疲软、贫富分化加剧，通过美国优先来保护自己的企图恰恰是在舍弃“美国力量”的根源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而这只是资产阶级垂死挣扎中的无奈之举。革命共产主义者应该采取的策略将是在肯定佐赫兰的胜选在社会主义理念的宣传和教育上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清晰而毫不客气地指出他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严重局限，揭露他巴结旧势力的蝇营狗苟，以独立而革命的理论 and 行动去教育无产阶级看清美妙动听的欺骗和对反建制政治家的无奈的信任，选举承诺中的空话和执政中的无数妥协都不会真正兑现一个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世界。从工人群众对两党政治的不满的怒火中只有诞生一个独立的群众性工人革命党，才能够真正汇聚并引领起改变现状的滔天力量。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II

# 巴西警察突袭贫民窟：“地下红军”夺权为什么只能是空想

作者：鼯鼠



## 里约热内卢在流血

2025年10月28日，里约州军警特种作战营、里约州警特种资源统筹局和里约民警在里约北区的佩尼亚与阿莱芒贫民窟发动了“遏制行动”（Operação Contenção），以打击上世纪巴西军事独裁时期由左翼政治犯在监狱中发展而来的城市游击队“红色司令部”，遏制其在贫民窟的势力扩张。当日行动警方动员约2500名警察，2架直升机、32辆装甲车、12辆工程车辆。在十余小时的冲突后，巴西官方更新战果：缴获步枪逾90支、多枚爆炸物与大量毒品，记录逮捕百余人，其中数十人来自外州。至10月31日—11月初，多家机构的伤亡统计出现差异：州政府口径为121人死亡（含4名警察），公共辩护机构则称至少121—132人死亡，而警方的伤亡在宣传中被严重缩水，警察实际被击毙人数普遍估计为20人以上。



### 被巴西军警抓捕的帮派成员

28日下午军警的突袭过程中，贫民窟内的多个帮派团体、武装民兵组织和红色司令部在多地展开反击。18点左右，红色司令部的成员开始在多个街口纵火焚烧轮胎，并起飞无人机对军警装甲车和警察局投弹轰炸。

晚间19点后，红色司令部成员占领了多个屋顶制高点，并压制了街头的警察部队。在贫民窟外围，红色司令部在各个交通要道和机场开始了大规模封锁行动，截止至20点几乎所有里约北区的关键桥梁公路都被红色司令部成员封锁，在里约全市造成了大范围交通拥堵。警方机动性被暂时限制的同时，红色司令部多个小队也在米塞里科尔迪亚山脚的城镇进行阻击。

凌晨时分，警方重新集结力量后通过直升机投送的方式再次攻入贫民窟，在接连占领了多个重要街口之后成功与外围警队打通了交通线路。凌晨至第二天早上的时间段，警方几乎控制了贫民窟的街头，截止至本文撰写时间，红色司令部在卡罗比尼亚和贝尔福德罗克所等地开展游击战，并于11月5日在里奥博尼托伏击刺杀了一名PMERJ军官。此次冲突标志着本世纪仅次于巴以战争加沙战区的大规模高烈度城市游击战在里约热内卢爆发。

## “红色司令部”与中国它“只说不做”的翻版

本次冲突中最亮眼的“红色司令部”源于上世纪70年代巴西监狱左翼政治犯结社，在早期通过绑架勒索官员富商和袭击警察局/军火库来获取资金和弹药。随着组织规模的逐渐扩大以及地下网络基本在全国城市贫民窟和农村等资产阶级统治的末梢建立起后，为了不激起政府的警惕和军警镇压，红色司令部逐步放弃了以往的游击战路线，不主动冲击政府/企业，转而利用自己庞大的行政和武装力量在巴西各地动员群众开展毒品种植/贸易。在垄断大半个巴西的毒品贸易的同时，红色司令部

还热衷于投资文化娱乐，尤其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 funk 音乐。它在地上大量资助 funk 音乐创作者，制作有叛逆反抗内核的音乐来吸引年轻人参加音乐会，并在音乐会上向人群宣传组织、灌输理论、推销毒品，以此来招募新人并盈利。红色司令部甚至与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和秘鲁多个游击队组成跨国地下网络：由地方领导小组和武装小队实际控制组织的生产和贸易运作，并以各地互保维系组织。

这样看，红色司令部的所做与中国互联网活跃的“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所提出的理论路线十分相似。引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在此基础上，地上组织和地下组织的力量大大发展，这时贫民窟的地下政权就随之建立了。它可以在地下秘密地逮捕和审判敌人。红色司令部可以持续派出武装力量，在政府统治薄弱的区域一边歼灭敌人一边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的势力范围，同时惩处敌人，巩固地下根据地的存在。在地下根据地，红色司令部有着绝对的优势。尽管企业照常开工，资产阶级政府依然在运作。”



### 葡萄牙语简称 C.V. 的“红色司令部”

巴西红色司令部不是一个力求动员、组织群众推翻政府的革命党，而是一个力求自身存活、用尽一切手段，甚至涉及黑产的军事组织。这就是中国马列毛大群幻想的宏伟大业只可能导致的结局。马列毛大群和红色司令部一样，将这种局限性辩解为“防守时期暂时的战术”。但是正如我们曾经在电台中指出：

“没有工人阶级或群众选择大批地加入到左派恐怖主义的行列中来，所谓的‘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也成了绝对的空头支票。”

换言之，“地下红军”的问题不是没做大，而是根本不可能做大。巴西的例子已经是这一理论实践里的极限，得益于巴西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才得以勉强存活。就是如此，在这次警察的突袭中他们也只能做最后绝望的抵抗：政府有“反恐”、“扫毒”的正当性，有先进的装备、更强的武装力量和更灵活的全国动员能力，红色司令部则有什么呢？他们只有极少数战斗素质不如政府部队的民兵，没有来自工人阶级的

支持和群众的组织，更没有政治性的能将这一事件上升为一场革命的开始的理想。

中国他们的翻版更是好笑和无能。巴西“左翼革命者们”起码真正地建立起了一支武装力量，构建了地下的网络，垄断了毒品贸易。中国的“马列毛大群”除了其中精神不正常者在工厂里大吼大叫“发动罢工”、网络群组里在被罚钱的压力下写出一些意义不明的文章、在TG群组里闲聊外，没有更多的本事。他们的“地下红军”尽管可以和巴西进行类比，但存在一种本质性区别：他们只说不做。你不可能在“严格禁止线下、身边活动”的情况下建立武装力量、组织黑产，一群想东想西的学生和前政治犯能干出的事情，自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点上也不能责怪“马列毛大群”的成员无能，事实上以这种路线在中国做到巴西的规模，物质上就是彻底不可能的。如果要明白像红色司令部这样的帮派和民武的本质，我们就需要了解它们在巴西赖以生存的土壤——所谓“统治阶级的末梢”，非法地下活动最密集的，军警不占优势、行政力量鞭长莫及的地方——贫民窟。

## 贫民窟：“红色根据地”？

贫民窟是纯粹阶级压迫的产物。所谓贫民窟，并不只是收入低的人住的地方，而是被系统性排除在教育、医疗、就业与社会关系之外，是被剥夺了谋生路径的整整几代人生存的巢都——当一个人从小生活在教育匮乏、医疗条件差、社会资源永远留给中产阶级子弟的环境中，这一个体被强迫面对的选择，是从一开始就被缩减到了零散打工的窄缝里，这种不稳定的低收入情况给了灰/黑产经济在贫民窟中发展的空间。我们看到的枪战、抢劫、街头毒品交易犯罪往往只是贫困人口中最显眼、最具戏剧性和暴力化的一小部分，而隐藏在背后的是大量剥削与掠夺。穷苦劳工被迫居住在基础设施崩溃的区域，房地产与贷款从破败的房屋和债务中榨取利润，企业把风险与不稳定全部丢给底层。在这种情况下赤贫并不是犯罪的原因，贫民窟青年之所以频繁出现在监狱名册上，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更邪恶，而是因为整个法律与治安体系被设计成通过监禁和枪杀他们来维持秩序。

而一旦当赤贫的无产阶级与犯罪被紧紧绑在一起之后，打击犯罪本身也成为镇压无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手段。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财政、规划与政策主动制造出贫民窟这种被隔离的空间，把劳动力集中封装在城市边缘，又能以治安、禁毒的名义持续向这些区域输出镇压、监控。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来说，贫民窟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是一个可以源源不断生产敌人的空间。只要犯罪率维持在足够高的水平，每一次扫荡和清剿就能在舆论上被包装成正义之举，成为选举动员、媒体宣传和军警机构扩张预算的正当理由。

红色司令部等帮派和民武组织正是寄生在这种绝望之上，它们的名称和口号看似激进，但实际上搞的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是对于赤贫者来说唯一实际存在的上升通道与安全感。提供武器、工资、贷款与保护伞，用比国家更迅速粗暴的方式兑现秩序、就业和身份认同。所以，诸多像红色司令部那样的地下民兵武装与企业化帮派在主动利用无产阶级的穷苦本身来巩固统治。它们深知国家只在利益需要镇压时才进入贫民窟，因此有意填补那些被政府放弃或顾不到的缝隙，也就是所谓统治阶级

的末梢（地下），去提供安保、仲裁和福利 也就是所谓“群众互助”，用赊账、施舍和暴力维系一种扭曲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所谓“基层夺权”。



### 巴西全国泛滥的毒品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贫民窟的无产阶级们既是被剥削的，也是帮派和民武的人质，一旦有人试图脱离、或组织其他力量，他面临的是对整个家庭乃至整个社区的连坐报复。而它们所谓的地下根据地也是建立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的供应链之上。红色司令部的组织结构中，真正的上游是军警、政府、买办——它们管理社会的基本运作和商品经济的流通，更具体的则是红色司令部销售的人脉；中游是分销、军火、赊账、高利贷等摧残人民的系统；下游是“安保费”、黑电黑水与交通线路的垄断“公有化”。每一项都能征到税，每一环都能从贫困里抽取现金流。所谓“红色司令部”等地下红军，在这种机制里更像是企业。它们打着革命的口号，实际在贫民窟对无产阶级直接的剥削和压迫甚至比美帝国主义还强，意识形态只是伪装，它们的底层逻辑仍是资本主义最血腥的一面，权力、利润、垄断与暴力。

我们也不能忽视了更大的历史与全球背景。像里约这样的城市并不是个例，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工的一部分。贫民窟中的黑帮贩毒等地下经济并不是与合法经济无关的黑暗角落，而是与银行洗钱、军火贸易、旅游业和房地产投机紧密勾连的其中一个节点。毒品利润和组织针对社区的税收最后总会进入正规金融体系，地下武装需要从合法与非法渠道购入武器，郊区、贫民窟的土地会被炒作成未来的基建项目。所以各方面严格意义上讲，所谓真正坚实的工业化“共产主义地下革命根据地”在目前这个高度流通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环境根本就不可能在什么“统治阶级的末梢”诞生。

在红色司令部所谓的地下根据地里，孩子在枪声中长大，在毒品与武装的阴影下被迫早熟，在十几岁就被要求在为组织卖命和在无底的失业与饥饿里苟活之间做选择，无数人在其中挣扎，消磨，死亡。在巴西政府的镇压与红色司令部的“革命”战斗中，贫民窟百姓看见的，是一次次轰鸣的清剿，是装甲履带压过狭巷、无人机

在屋顶投下爆炸物、亲朋好友被莫名其妙的拖出屋外乱枪打死在街头。军警撤退之后，“红军们”回到“根据地”，重建毒品制配室、割下所谓叛徒的头颅后把被扒了皮的尸体吊在路灯上、抓走无数孩童充军、继续层层加码地敛取费用；学校依旧缺师，诊所依旧无药，负债却比昨天更高，生存也更加没有希望。白天的屠杀与夜晚的混乱，像双轨并行的恶鬼：一条由国家演出，一条由地下红军经营，最终都把手伸向同一张地狱的餐桌。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海南琼中农运

作者：红十月



10月31日凌晨，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加钗分公司派人潜入琼中县加钗镇内某个村的村民农田，偷偷将村民赖以生存的槟榔树全部砍伐一空。清晨开始，大批愤怒的村民将被砍伐的槟榔树堆放在公司大门口抗议，高喊“打倒土匪窝”，部分人登上公司平台砸毁招牌。村民掀翻了多辆海胶集团的车辆、抗议者向赶来的警方和公司人员投掷石块。随着消息扩散，周边乡镇民众陆续赶来声援。抗议从白天持续到深夜，直至当晚警察鸣枪驱散群众，并封锁进出琼中的多条高速公路，抗议的民众才渐渐散去。

### 1. 矛盾因何而生？

这件事情看似是龙头企业与村民间的土地纠纷问题，实质上是资本的无限制扩张与村民们赖以生存的方式间产生了间接性的冲突。

我们先来谈谈现实的土地纠纷问题。当我们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看到村民们一手举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我们就已经在法律上认可他所拥有的土地了。《土地管理法》第九条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反观公司，却一直在生造一些看似强硬的观点，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因为村民们强占了我所租来的土地，所以我只能在夜里偷偷去行使我对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其实这个观点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既然本身土地的使用权就是你的，那你就光明正大地跟村民们要回来呗。有理有据的为什么还要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由于信息差导致的，他们的土地可能早就被他人暗地里给承包给公司了。而村民们只是毫不知情，处于被动的状态。甚至公司指责那柏村委会猿胎返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并称“曾多次表达可以签订租赁合同，村民缴纳租金使用，但遭拒绝”，因此在10月31日“依法清理非橡胶作物”。那么根据《土地管理法》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所以说发包方是有知情权的和土地转包权的，并且承包转让的合同需要当场证明。如果说是发包方有人以集体名义擅自将土地发包给公司，那么他这种行为是不顾本集体组织成员的优先权，本集体组织成员有权申请确认该项交易无效，从而行使自己的优先权。在这场事件中，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公司强占土地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红线，它没有任何理由任何依据也不可能会有任何理由任何依据的。

在如今的自耕农时代，资本为了自己无限制扩张而不顾农民们的死活。资本贪婪地吸食着人血，只为了能在这个时代中哪怕苟活一秒。而自耕农们因生产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先天弱势，本身就会受到资本的欺侮。他们仓促地去适应这个农业资本化极具发展的社会，却忘了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一方净土。他们不仅要承担相应的地租，还要接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剥削。比如说作物丰收了，他们要想把作物卖出去就得经过作物市场化的一个过程。农民对土地的核心诉求仅仅是保障耕种权和土地肥力，企业却常为逐利突破土地用途红线。他们任劳任怨地接受着本不应承担的，而是农业资本化的社会强加给他们头上的赋税。他们没有义务去服务于农业资本化的社会，他们也理应有选择权去选择自己想要的靠自己劳动所过的生活，而不是成为被资本所雇佣的奴隶。

## 2. 龙头企业带来了富裕和幸福么？

据资料显示，海南橡胶是一家大型国企，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29日，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橡胶加工企业。2011年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2025年位列《财富》中国500强第315位。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海南橡胶）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唯一的天然橡胶全产业链上市公司，和全球最大的集天然橡胶科研、种植、加工、贸易一体化的跨国企业集团。



### 《土地管理法》不会保护农民的权益

而这样庞大的跨国垄断公司，在中共的对外宣传口径中往往都是“民族企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象征。可这样的龙头企业，到底为人民带来了什么呢？在此事件中可见一斑：依靠着庞大的资源和与政府的勾结，肆意的欺压普通民众，以“偷盗”的形式侵吞村民们的财产。

在案发后，海南橡胶抖音官方账号上10月31日发布通报称，涉事地块在该集团加钊分公司地界红线图内，该公司对该地拥有合法的使用权，因该地被由那柏村委会猿胎返村村民非法占用至今，村民拒不停止侵权及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才对该地块上的非橡胶作物进行了清理，从而引发双方冲突。——原来趁着凌晨偷偷潜入村民农田砍伐是“合法使用权”的行使了！

他们有恃无恐的傲慢姿态从何而来？庞大的资源力量、用剥削劳动者的金钱培养和影响的媒体、政府和公司的沆瀣一气，等等等等。这就是“民族企业”的真实面目，他们给人民带来的只有更为建制化的剥削和压迫的机器、和政府等的狼狈为奸让他们可以肆意的侵吞人民的权益。“全球五百强”这庞大财富和力量的背后，是由多少劳苦者血泪所堆砌起来的？

当然，在此血淋淋的示例之外，我们也可以单纯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去看看中共官方所宣称的“龙头企业”的谎言。

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语：企业发展成龙头了，国家发展好了，剥削压迫就会轻了，就能实现共同富裕了。这句话中其实存在三个逻辑关系。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逻辑关系，企业发展好了，剥削压迫就会减轻。其实这句话就是在把“企业规模扩张”等同于“社会责任提升”，忽略了资本逐利的本质属性。龙头企业的核心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发展逻辑是通过占据市场垄断地位、压缩成本（例如人工成本）来实现规模扩张。龙头企业的发展只会越来越依赖于加重剥削劳动者。而国家的综

合实力迅速发展看似是靠龙头企业带着经济发展上去的，实则是靠广大的劳动人民靠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劳动所换来的。国家所代表的意志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它所代表的是资本家的利益。它作为一个仲裁者，它的任务不是对企业龙头进行无限制压制，而是限制劳动者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剥削而奋起的反抗。

我们再来分析第二个逻辑关系：国家发展好了，剥削压迫就会减轻。我们知道，国家发展的核心是“综合国力的提升”。但这个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建立在底层劳动者的汗水上，他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是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资本家越来越富，被剥削的底层人们则越来越穷。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往往是剥削体系自我维系的手段。看似的福利提升、劳动条件改善，本质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保障剥削持续进行，而非真正减轻剥削。

最后，我们来分析第三个逻辑关系：剥削压迫减轻了，就能实现共同富裕了。首先，剥削的本质是一部分人凭借生产资料占有权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特征之一。共同富裕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基础上的全体人民的富裕，而不是在保留剥削关系的前提下“减轻剥削”就能实现的。只要剥削存在，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就会持续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源没有消除，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

### 3. “人民政府为人民”

在企业派人偷伐，农民抗议后，我们的“人民政府”做了什么呢？

是警察鸣枪驱散群众，封锁交通道路，翌日清晨警力全面接管现场，在周边巡查；是事件发生后，下架一切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农民聚集和“警民和谐”内容，封禁相关村民账号；是琼中官方发布通报，宣称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并称“目前态势平稳”；是当地政府出面促成双方“和解”，促成“补偿”。（槟榔树的经济价值极高，自育苗至结果需7至8年，而事发正值每年10月的采收旺季，损失难以估量）

从事发当场警方暴力清场，到事后交通封锁，信息管制，通报“态势平稳”，政府充当“笑面和事佬”进行调节。软硬相合，快速维稳，共创“稳中向好”、“和谐、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令人叹服行动之高效，就连政府门口那块“为人民服务”的牌匾也显得更加高傲耀眼了些许。

这也并非是“人民政府”第一次以全方位的维稳手段解决群众斗争和抗议事件，八月份江油事件的记忆还未远去（参看 [《江油运动 - 还做梦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群众性斗争被暴力镇压维稳的案例在如今已病入膏肓的中国社会里已不再令人感到新鲜，近几年群众斗争事件的数字正以爆炸性的速度飞增，他不会因中共政府的暴力维稳和管制而削减，而正在以越发猛烈的态势冲击中共的整个国家机器。如今几乎这每天都能看到的全国各地或大或小的抗议和斗争，正在逐步瓦解如今统治阶级“伟大复兴”的幻梦。而无力从根源上解决甚至是稍微缓和社会矛盾的统治阶级只能以愈发露骨的方式以暴力维护他所依存的社会秩序，他也就愈发彻底的暴露出自

己作为“人民政府”的本质——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整套国家机器。

## 4. 农民们的诉求如何才能真正实现？

在此件斗争事件中，村民们的反抗在一天内就被国家机器镇压，同时一切可能在境内平台传播此事件的视频等材料也是全军覆没，只留下几句黑话和暗语在内地互联网的角落。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村民们的英勇斗争在这种成体系的暴力机器下显得是有多么渺小和脆弱，就如我们过去几十年间所看到的中国各地发生的大大小的群众斗争事件最后的景象一般：在局限于狭小地方的、没有预先准备、没有完整和成熟纲领和诉求、没有基本的组织性等等的前提下，走向最后几乎是轻而易举就被国家暴力机器和审查机制扼杀和镇压的悲剧结局。



**“态势平稳”、“稳中向好”**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此事件中矛盾的本质问题，在资本主义重建后的中国，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逐步且愈发快速的将自耕农等小农抛入无产者和失业者的大军中。资本在如今的中国以重演他在世界历史上无数次扮演过的角色那样以最为野蛮和血腥的方式构筑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后无数悲惨劳苦者被剥削和压迫的现实。

如何才能彻底走出过去数十年来无数斗争事件的悲剧结局？如何才能让不论是农民还是一切其他劳苦者都能真正的砸碎我们身上的链条走向真正的而不是中国口中虚伪的“社会主义”？

我们回答：只能以建立一个统一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彻底砸碎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才能让一

切劳苦者不再受着高踞于我们头上的吸血鬼们的剥削和压迫。

对于农民们，无产阶级民主下的计划经济将会逐渐和彻底的使城乡差别消亡，在不受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影夏下大规模的将农村发展为现代化的城镇，实现中共宣程却绝不能实现的城镇化，同时在工业的支持下使农业实现机械化，以远超如今小农耕作的劳动生产率的建立起集体化农庄，以吸引而不是靠着行政命令的强迫农民们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获得远胜于今天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当然，这些前景只有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健康民主的计划经济下才有可能实现，这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后才能真正完成。对于今天依然受着直接的剥削和压迫的农民来说，则首先需要的是以有组织的持续性斗争迫使政府原本的维稳手段无法在短期内摧毁集中起来的群众，在此条件上才能提出自己的不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方面的诉求，例如在此事件中迫使对方完全以比种植的全方位的成本损失更加高额的补偿去保证对企业的威慑、要求政府彻底明确地产权划分、保障村民们免受不法侵害、要求以国家政策和法律保证假使农民们的土地被收购后也要保证就业和住房安置、要求集会示威的权利、要求地方人大真正实现民选等等等等。

而这些的前提也只有在有一个坚强和富有战斗性的组织下才能做到与政府和企业实现对峙乃至令对方让步接受自己的要求，也只有在一次次的这些取得成果的群众斗争中才能逐步的锻炼群众的抗争精神，使得被剥削阶级的各个群体阶层意识到彼此作为共同的被剥削者的阶级认同和力量，逐渐提高群众的革命意识，以至于为最后的全国性大革命积累一切必要的条件。

而这，都得从建立一个坚实的群众性无产阶级先锋队开始，只有这艰苦但又无另外的捷径可走的道路，才能彻底走出过往数十年来悲剧的一次次重演，才能真正实现无压迫和剥削的新社会。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香港火灾——十一分人祸

作者：邹晓衍



“怀着沉痛的心情，对所有在灾害中逝去的生命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2025年11月26日下午，位于香港新界大埔的宏福苑发生了令人无法接受的、惊心动魄的夺命火灾。8栋正在进行外墙翻新工程的32层住宅被竹棚架、可燃防坠网和泡沫塑料包围，下午2点，某处工程位置被发现明火燃起（截至本文撰写完成，暂无查明起火原因），但火警钟并未响应，途人一边拍摄视频一边呐喊救火，然而在短短十分钟内，火势顺着大量可燃泡沫塑料和防坠网一跃冲天，瞬间吞噬了其中一栋住宅楼。下午4点，火势蔓延到7栋住宅楼，至夜间已经将屋苑完全吞噬，造成数百人伤亡，1名消防队员殉职。

1900多户居民失去了他们的家人、住所和一切财产。11月26日当晚，火势在事实上已经接近失控（火警在下午6点22分发出了5级火灾信号，被视为63年来最为严重的世纪大火灾），救火行动只能被局限在消防队员的赌命之中——他们只能冒着大火冲进大楼，挨家挨户地拍门救援被困居民；与此同时，大量社会福利机构火速自发响应到援助行动中，包括但不限于市民自行捐赠物资、车队免费运输、

私营店铺免费开放提供庇护所等。



火海中的宏福苑

## 十一分人祸

宏福苑大火绝不是什么天灾和意外，而是一场典型的由于资本主义的逐利和政治力量的腐败而导致的系统性人祸。尽管坊间大多数猜测都认为起火的原因是工人在禁烟区乱丢烟头，但截至本文撰成，尚无可证实的起火原因，故在此问题上钻牛角尖是无益的。

但是一个可以已经被证实的事实是：该屋苑的防坠网和塑料泡沫是在救援过程中被消防队确认是不符合建筑工程标准的。第一，防坠网所使用的是 50 港元一张的非阻燃网，而非 90 元一张的阻燃网；第二，使用塑料泡沫来覆盖窗口本身是不合规的。这同时与另外的事实产生对比，并形成令人匪夷所思的强烈误差：首先，该翻新工程由屋苑业主立法团自行寻找承建商进行，合同总价为 3.3 亿港元，照理不应在此等材料购置上出现这种低端失误；其次，业主法团本身对承建商工作具有监视权，并在 11 月 27 日早的媒体中透露出验证过防坠网的可燃性，照理也不应该会导致悲剧的发生。该工程先前也存在过相当的争议。早在 2024 年初，香港资深工程师潘焯鸿早已介入此天价合同协商，并详细调查了防坠网购置的成本差异达到了 400 万港元，个别居民也曾亲身测试物料高度易燃并早早反映，但是并没有获得任何监管部门重视。居民和工程师在尝试进一步揭露问题时，当区区议员黄碧娇选择站在业主立法团一方，认为监察的声音是“妖言惑众”，并呼吁业主支持法团，确保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



黃碧嬌 Peggy Wong

24 Aug 2024 · 🌐



宏福苑現屆法團得到大部份業主於5月25日投票產生第十二屆管理委員會，到今天還不到3個月，就由民主黨莊×輝挑撥式地直播屋苑維修事項，道出的事都係妖言惑眾!

實在大維修工程現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必需同心同德為穩定屋苑為順利完成大維修支持現屆法團繼續留任!反對罷免! 🙌



### 区议员黄碧娇在社交媒体上对业主立法团的声援

然而这就是为大多数工人所不愿轻易相信的，但确实是无比真切的事实——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就连人的性命考量，都成为了商品交换逻辑的延伸。业主法团寻求承建商（宏业建筑），承建商将工程工作外包给顾问公司（鸿毅建筑师），在一层一层的转包中，各方寻求在交易过程中赚取合同差价，或者是压低物料成本来攫取超额利润。此时，安全标准、住宅区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面对诱人的货币利润前显得一文不值，被商品交换的逻辑所抛弃，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一间间的单位是屋苑里所有工人阶级出卖了他们一生的劳动换来的住所，然而工人阶级半辈子的劳动凝结，却在合同层层外包的货币交换中被无视，成为了风险转嫁的对象。除此之外，监管工作亦存在真空，在香港廉政公署宣布介入调查工作之前，基本上无人得知业主立案法团和承建商之间的监管工作是否完成得天衣无缝、或者是否存在不见得光的利益输送，然而，工人阶级面对这种具备庞大资本和专业知识的公司团体的交易时，信息完全是不对等的，基本处于被剥削的弱势地位，他们的血汗钱被资本的交易充当了风险对冲的基金和大火的燃料。

当然，毫无作为的政治力量也难辞其咎。具备一定社会公众发言权的区议员，在实际的工作中十分微妙地背叛了她的竞选誓言——不用多说，几乎每个资产阶级专政下的选票政治都要声称他们代表了某个地方的人的利益。然而，当宏福苑的工人阶级对他们切身的工程工作表示担忧和怀疑的时候，区议员竟然反过来批评工人阶级是“妖言惑众”，在获取了工人的选票后就把工人抛在了脑后，甚至不惜利用中共的“政治正确”来作为自己屹立不倒的辩驳。可见，香港的区议会在事实上并不具备任何的工人代表性，此制度的存在纯粹是在形式上哄骗工人，亦为投机主义者提供了平台和晋升跳板，至于每一位活生生的工人，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张张选票，是他们青云仕途的垫脚石。

然而这便是新自由主义发展得成熟而带来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恶果：投机和加杠杆成

为了他们的主要牟利手段，因此这群吸血鬼会企图在任何能牟利的环节，将一切成本压缩——包括但不限于为了压缩成本而违反规则和生产标准，或者是把风险成本通过外包和融资的形式转嫁出去，无论是哪一种，资本主义都再一次向工人阶级展示了它在追求利润的道路上的面目究竟是多么丑陋。

## 工人阶级分化

在这场灾难中还有另一角色相当值得探讨，那就是在事故开始的时候一度引起网络讨论的“竹棚架”的问题。在事故发生后，许多声音首先将矛头指向了竹脚架的使用，其可燃性被指控为导致大火迟迟不消的主要原因，香港由此被批评为是表面上繁荣却形式上落后的城市，在建造技术发达和成熟的今天竟然还会使用竹架来进行建造工程作业，实在令人费解。随后，关于竹棚的使用争议在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工人之间愈演愈烈，从一开始的科学事实的争辩迅速上升到了地域之间的攻击，最后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了意识形态的剧烈对轰。

首先，“竹棚协会”事实上存在，并结构于在香港建造业总工会下，总会长周思杰曾经在面对金属架淘汰竹棚架的争议时提出：“关键问题不在竹棚，而是背后三四千工人的劳动生计。”表现出了强烈的行会主义。搭竹棚在香港存在一个专业的工人群体，考核制度层层把关，特殊技能被垄断在圈子内，并享受相对的高薪（平均日薪达到2000港元，折合250美元左右），在长年累月的发展中形成排他性极高的工人贵族小圈子。在这一步，他们十分巧妙地把“工人生计”和“生产隐患”绑架到了一起让社会做选择，逼迫其他工人在安全问题上进行退让。同时，工人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铁饭碗”和技术的垄断地位，不惜与剥削阶级媾合，共同将竹棚使用上升到了虚浮无比的文化价值观上，鼓吹这是地区特色，并一同抵制早已成为全球建造标准的金属架使用。因此，在一方面，竹棚问题是剥削阶级收买工人贵族的问题，在事实上竹棚的成本是低于金属架两倍甚至以上，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压缩建造成本，以赚取高额利润，剥削阶级通过鼓吹虚无的地区文化，并通过垄断行业规模培养专业技术的工人贵族，以抵制工业化标准的革新，利用其落后生产力获得无与伦比的超额议价权，同时，一切其他工人的风险考量都要为此让步牺牲；另一方面，被高薪和行业垄断豢养起来的工人贵族，在内容上已经背叛工人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高薪地位，不惜为剥削阶级发声，迎合他们的“文化鼓吹”，当他们高呼抵制的时候，其实维护的是香港资产阶级剥削、将工人生命置于不顾的权利。然而，网络上不少声音围绕竹子是否可燃的科学事实吵得不可开交，认为对竹架使用的批评是忽视了防坠网和监管不力两个重要因素，事实上，这些问题全都应该予以重视和批判：竹棚问题的本质是工人阶级分化的问题，防坠网问题是新自由主义下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交易问题，而监管不力，则是政治力量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下的表现出非工人阶级代表的性质的问题。

而工人阶级的分化也不局限于香港内部，对竹架的使用的争论同时也使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工人互相攻讦，内地工人批评香港“国际大都市用竹子”、“落后”、“草菅人命”，这迅速引起了香港本地工人的情绪反扑，香港工人把“竹棚”上升至“香港独有文化”，为竹棚添加了非凡的社会历史属性，并以“灵活变通的狮子山精神”作为武器予以回击，纷纷发表意见论证竹子并非可燃，亦非大火成因，并

逐渐将回击的层次上升，甚至提出“批评竹架使用是为了给中资金属架入港开路，目的在压迫香港本地工人的生计”、“灾难成因全因使用了内地生产之防坠网”、“内地输入的工人劳动不守规矩乱丢烟头才导致的灾难”等论调，科学事实的争辩从而演化成两地工人的意识形态对抗。这种对抗如何有害于两地工人呢？第一，资产阶级在对抗中完美隐身，横向的群众争议模糊了40块差价的劣质防坠网、赚取3.3亿工程费的承建商和监管失职的港府、劳工署的问题，真正的罪魁祸首没有被清算，工人在互相的鄙视中消耗了能量；其次，工人对抗陷入了“比烂”的向下竞争，香港工人出于严重的本土情绪，为了反驳内地批评，不得不极力证明竹棚也是安全的，甚至扬言竹棚不可燃，甚至对竹棚在火灾中的系统性风险视而不见，这是一种病态的防御，为了维护“面子”和“独特性”，实质上是在不断降低自己的生存标准，拒绝学习和引入新技术，与其说是保卫自己的尊严，不如说是在牺牲工人自己的利益去维护剥削自己的阶级的权利；第三，这种意识形态对抗使香港工人对中国大陆地区极为仇视，将中国大陆地区的一切标准视为威胁，而同时中国大陆的工人也在嘲笑香港工人的无知，阶级矛盾此时变成了阶级内部矛盾，两者分别在罗湖桥两边被各自剥削自己的资本家逐个击破，严重破坏了两地工人阶级团结的可能性。

## 政治中空

香港政治力量的中空和腐败也是这场世纪大火灾的罪魁祸首之一。其不仅反映了新自由主义下垄断资产阶级的丑陋，同时亦展现了资产阶级政府是如何在社会生产中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在香港，业主立案法团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组织，产生方式为由大厦所有业主通过投票选出“管理委员会”（MC）委员，拥有极大实权，法定权力包括：代表所有业主签署合同（清洁保安、维修工程）、管理大厦的公共基金和财务、制定和执行大厦公契、在法律诉讼中代表大厦。从初衷看，理论上是体现了资本主义下“私有产权”下的民主自治，让业主自己管理自己的家园，避免被物业公司欺压。不过，虽然名义上由业主选举，但内容上法团活动基本上和小业主（住在此处的工人阶级）脱离，大多数工人基本由于工作无暇参与法团政治，这导致权力往往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握。这就像一个微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它利用程序的复杂性和部分工人的政治冷感，窃取公共决策权，变成了骑在工人头上的官僚机构。在宏福苑3亿多港元的天价维修案中，法团是必须的签字人，建筑商无法直接从工人口袋里抢钱，因此只能通过和法团成员交涉进行（贿赂、宴请或利益输送），但是这个过程，如上所说，工人首先政治冷感缺乏参与法团政治活动，其次就是权力被法团垄断，大部分工人处于信息不对等的地位，等于是将生杀大权交由法团和建造商的交易过程中，由悲惨的事实可见，生命考量并不在双方交易考虑范围内。

那么问题来了，当中的交易过程就真的没人能介入吗？

如上文所述，资深工程师和工人都曾介入过工程纠纷，早在2024年9月，工人早已发现其使用的防坠网是可燃的，并分别尝试联系了当区区议员黄碧娇（在事故发生后装聋作哑、含糊其辞），以及撰写投诉信件至香港劳工署（目的在于投诉工程劳动之不合规处），但后者无人受理，直至事故发生。技术权威和前线工人的预警

被行政和政治力量无视，这不仅仅是官僚主义和个别失职的问题，而是新自由主义社会的阶级属性的彻底暴露。

在新自由主义逻辑下，技术专家的意见只有在“提高效率”或“降低成本”的时候才会被采纳，一旦技术意见触及成本的增加或延误工期，那么资本将会马上露出嘴脸：“你现在不要跟我谈钱。”在这里，真理的阶级性展现得更加彻底，没有资本背书的科学事实，在起初一定在诱人的利润前显得一文不值；其次，劳工署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下的“监管化”也是恶因，劳工署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其在这个社会下的作用不是保护工人利益，而是缓和阶级矛盾的减压阀（帮助工人就业的事实也无法否定它缓和矛盾的角色），香港长期推行“大市场、小政府”，在建筑安全领域往往取用的是“非强制性指引”而非严刑峻法，这给资本家留了耐人寻味的灰色地带——出了事是“意外”，没出事就是“繁荣”，因此，无视工人诉求充分展现了其香港政府的一般成色——维护商业运作的流畅性要高于个别工人的生命权。

而区议员在上文也有提及，这里暂且不论派别，作为现行体制内的民意代表，往往沉迷修桥补路、处理噪音等无害议题，当面对大型承建商、法团等庞大的利益集团时，区议员往往选择退避三舍，因为要和这些规模的集团进行斗争，只有通过组织群众来进行，而这完全超出了资产阶级代议士的政治意愿，他们无视工人的工程师的诉求，证明了目前的政治架构基本不具备工人阶级代表性，他们只是为了每四年一次的选票而存在的推销员，而不是工人利益的捍卫者。

## 小结

从“贪污”到“结构性合谋”，为商压低成本偷工减料、为官避事默许违规、为政装聋作哑左右逢源，这种行政 - 立法 - 资本的铁三角，共同构成了绞杀工人系统性利器，并最终酿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特级灾难，截至本文撰成，该事故已造成 128 人死亡，依然有 200 多人失联，工人一生的劳动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这场令人痛心无比的故事再一次向全世界工人说明了：只要政权和监管机构依然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逻辑，工人的生命安全就永远是可被牺牲的统计数字，所谓的“专业意见”，在资本的狂欢面前，不过是刺耳的噪音。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高市早苗引起的外交风波： 民族国家、外交与资本

作者：红十月



## 事件概括

马克思曾说：“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最近，中共似乎很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奸污”：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预算委员会上公开表示：若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日本可能会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从而依据《和平与安全法制》行使集体自卫权。这番言论代表日本将“台湾有事”直接提升为日本自身的国家安全威胁，突破了以往相对模糊的政策表述。中国方面随即强烈反弹，指责其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并挑战中国主权，随即召见日本大使、向联合国通报情况，并采取包括旅游警示、暂停部分交流、限制海产品进口等反制措施。日本政府则拒绝收回言论，强调立场与既有政策一致。事件迅速引发中日外交关系的紧张，也在日本国内掀起争论，人们担心高市的表态可能把日本带入潜在冲突风险。整体来看，此事件不仅加剧中日对立，也可能对东亚安全架构、日美同盟运作及台海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 中国方面 - 主权观念

当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言论传出后，中方光速应战。中国外交部、大使馆、军方以及御用媒体都纷纷表达了强硬态度。他们甩出的第一张牌，关乎“主权”。主权是什么？主权是排他性的、自我管理的政治权力，是“自主自决”的最高权威。他们如是主张：因为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所以只要其它国家试图染指台湾，那么便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哪怕中共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共试图宣称自己尚未得到的东西。跟在它后面应声附和的小粉红越多，下述问题就越是被掩盖起来：凭什么说中共的这种宣称是正当的？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中共就搬出了历史学家与各种陈旧的条约与文件。只要保有基本的政治素养，就会知道，这些故纸堆也不会在这种原处的意义上赋予我们真正想要看到的“正当性”，因为它是（至少在现代人看来）最不恰当的东西的产物：野心、战争、扩张、霸权、帝国主义与排除小国的巨头会议；而它之所以会被当作今天国际秩序的依据，也不过是因为国际局势还没有改变到需要大规模变革以致于对过去的秩序进行激烈的否定的地步而已。如果“寸土不让”被当作正义，那么中共就没有理由将熊瞎子岛的一半划给俄罗斯，也没有理由放弃那些“本可以属于中国”的领土。因此，我们的兴趣不在于找到这个道德上的“第一推动力”，而是要申明，许多这些被人们下意识看作“正常”或“正确”的东西，其根基远没有我们所想象地那么牢固；社会也不是依靠这些观念上的正义运转。但统治阶级塑造的文化霸权却恰恰是要人相信，社会就是在依靠这些观念运转，好像中共对台湾行使主权之后，中国的社会制度、经济现状、阶级构成就会发生什么改变似的。

此外，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真正拥有主权的、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面对日本这一“次帝国主义国家”的挑衅，其统治阶级还会摆出“天朝上国”的姿态，将日本视为“畏威而不怀德”的“蕞尔小邦”。因此，在这次事件中，中共官员所展现出的不仅是强硬，甚至带有明显的傲慢。从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所发布的“斩首”言论，到中日外交官之间的交锋，都清晰地反映出这种“大国”观念。中国资产阶级自觉“高日本资产阶级一等”的心理，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长期被引导、被动员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了呼应。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崛起的野心，也在无意中戳破了自己一直以来鼓吹的“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一套漂亮话，试图恫吓那些与自己有冲突的国家，让他们认识清楚表面和气的背后有着可怖的大棒，而它才是真正的、百试不爽的、无可替代的解决国际矛盾的终极手段。

在这次，观念远不止是嘴中说的东西，还立刻变成了现实：中方配套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包括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提醒公民谨慎赴日旅游和留学、中止日本ACG内容引进、暂停各类日本艺人巡演，试图在经济与社会层面对日本形成压力。特别是文化方面的限制，甚至引起了相关爱好者的不满，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以致于我们这些只是欣赏作品的人也“躺枪”呢？但这恰恰说明，观念的东西并非浮在天上，而是靠地上的东西，即经济基础维持的。现实显露出来的却完全是颠倒的景象，好像仅仅为了维护观念，经济基础就要因此受到损害。这种颠倒根植于生产方式本身的颠倒：这些经济活动虽然本质上是人的劳动的创造性过程，但是它又被异化为创造控制自己的对象的过程，从而首先表现为资本增值，又

是国家运转的支柱。既然资本掌控了劳动，又维系着国家，那么这些经济活动就转变成了完全客观的东西，变成了被外在于它的物所掌控、统治、利用的东西。正是经济养活了国家，国家才能够以控制，然后打击经济的方式打击别国。每次经济方面的打击都伴随着经济的衰退、无产阶级的失业与社会的隔阂。但是，既然在这里观念是首先被考虑的东西，那么这些“小小的”却“必要的”痛苦自然是接受的。



### 滨崎步上海演唱会因“不可抗力”取消

当然，观念的存续还必须依靠将观念视为纯粹的观念的人。中国政府及其附属媒体严厉批评高市早苗言论后，一部分“粉红”迅速跟进，在微博、抖音等中国社交平台发布文字或者视频予以谴责。其中包括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等知名建制派人物。简中互联网也出现了大量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恶搞图与讽刺性内容。这给了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却又被观念牵着鼻子走的人们一个用愤怒表现狂欢的机会。正像他们被观念牵着鼻子走的特征一样，他们也可以在观念中对日本发动“神圣的讨伐战争”，在观念中侮辱这个小国，并在观念中恢复民族的荣光。一旦观念中的东西走进了现实，一旦战争让他们感受到的首先是戒严、短缺、爆炸、破坏与死亡，有关战争的所有虚无缥缈的观点就会被抛诸脑后，并代之以最现实的观点。

中共继续围绕台湾制造宣传攻势，也是维持这些观念的手段，而这又与其将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的现实考量有关，以此转移在国内严重经济危机背景下愈发频繁的中国无产阶级抗争的注意力，增强中国大小资产阶级的凝聚力。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宣传政策就是与稳定绑定的。尽管中共长期纵容以及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但同时又高度警惕这些情绪从线上蔓延到线下，重演十多年前反日游行的失控局面，进而反噬其统治的稳定。许多网民反映，因在网上发表所谓的“暴论”而遭到警方上门或约谈。这比任何证据都能有力地证明，民族主义不过是中共规训民众的工具；中共比谁都清楚，他们要的也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观念，而是通过宣扬这种观念能够对自己带来的好处——合法化强硬的外交政策与强化民众的顺从。一旦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它就会对自己曾经狂热追求的东西丢弃在一边。



### 因反日示威而起的 2012 年西安砸车伤人事件

然而，中国民间也出现了更多不一样的声音。一向沉迷于“爱国主义叙事”的中国小资产阶级，此次也显得沉默，甚至做出让官方不愿看到的选择。网络上的舆论也非一边倒地支持中共，在一段拍摄于东京，一个中国男子挥舞国旗的视频评论区内，可以看到大量嘲讽的留言。在当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发加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背景下，愈来愈多的工人阶级对中共的民族主义叙事不再买账。正如“赢学”现象所展现的那样，在中国这个人们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互联网上的某些声音反而更能折射出工人阶级的真实情绪。当工人们只能在观念上感受海洋另一边传来的“侮辱”，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压榨与剥削时，任何人都会知道他们将会选择什么道路。

## 日本方面 – 民族国家

而在日本方面，自民党政府对高市早苗涉台言论的态度同样强硬，明确表示绝不撤回相关表态，甚至对中日关系可能的进一步恶化也并不在意。在其看来，一旦让步，不仅会被视为“对中国的示弱”，从而助长中方的“气焰”，还会引发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强烈不满。这股被煽动起来的“大和民族主义”浪潮，反过来也可能吞噬正是依靠民族主义情绪上台的高市早苗政府本身。因此，日本一方面做好准备应对中国发起的信息战与舆论攻势；另一方面则与美国紧密配合，向其他国家阐释其所谓“维护弱小国家权益”的“正义立场”。

在中国军事压力不断放大的刺激下，日本资产阶级的安全焦虑持续上升；再叠加其对“正常国家”地位的长期渴望，自民党政府由此加速推进一系列激进的安保政策调整，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其军事化进程正被进一步推上快车道。整个东亚越发陷入可能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泥潭中。

日本貌似是想要“保卫这个民族”，这听起来是一个正当的口号，然而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它会不可避免地滑坡为“保卫这个国家”；而许多扩张行为正是以“保卫国家”为掩饰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互相对立，不过是各种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而已。尽管是个人的存续与劳动维持着国家的存续，但由于这种“其它国家的威胁”，就表现得好像没有国家，个人就什么都不是。这种颠倒的原因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个人劳动的异化。国家承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都只不过是维持资本剥削劳动从而异化劳动的环境，让这种“过去遗留下来的情况”世世代代被再生产出来。就这个意义来说，是民族国家自己在创造它的危险境地，正是因为这种颠倒在每个民族国家都广泛且深刻地存在着，每个民族国家才能维持自身的存续，从而继续再生产着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这其实只是为了说明：想要消灭我们通常所担心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侵略，从任何某个国家的观点看来，都是不可能的，最终必须站在全体人类的角度，要消灭掉国家本身。而这不经过全世界的革命又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方式只会肯定它的存续。



### 日本工人阶级的猝死率正因一周 60 小时的工作时长而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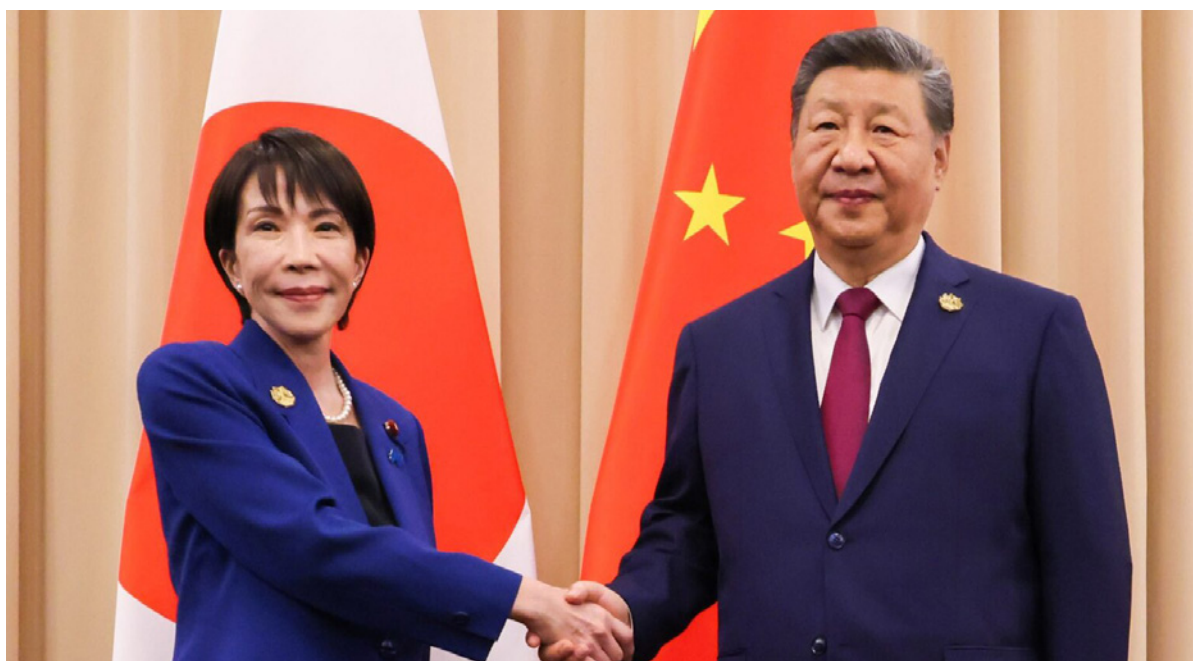
再来看日本民间的反应。部分日本网民对中共的“战狼外交”表达了强烈不满。尤其是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发布带有挑衅甚至暴力威胁意味的“斩首”帖子后，更是在日本民间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日本政府官员、议员发声谴责，社会舆论也同样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在外交场合的傲慢态度，以及日本极右翼的推波助澜，共同激发了日本社会对中国的集体不满情绪。这种情绪背后，是日本长期少子化、老龄化所造成的经济停滞与社会困境。今年上半年爆发的“米骚乱”、以及当前持续发生的“熊灾”等事件，都折射出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深层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并不轻松，普遍处于低水平的生存状态。近年来中国移民人数激增，更进一步放大了日本国内关于文化冲突、就业竞争与治安问题的焦虑，而日本极右翼则敏锐地利用了这种不安。在高市早苗的竞选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这种将本国资本主义失败归咎于他国的典型叙事。

高市早苗的这番言论，不过是将台后早已暗流汹涌的多重矛盾一次性推到台前，使各国资产阶级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对稳定的时候的各种虚伪的“和平相处”逐步失效。即使是和平相处的时期，国与国之间也总是充满了竞争、排斥与猜疑。作为“站在社会之上并与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国家必须要解决一件事：它凭什么是唯一的“最好选择”，凭什么无产阶级最好听从它的愚弄而不是另一个国家的愚弄。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总是要对其它国家保有某种警戒之心，时刻准备着以其它国家的失败与自己的成功证明自己的必要性。从更深层看，这也是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在东亚地区的反映。无论是中国、日本、台湾，还是美国，资产阶级政权在这场冲突中从头到尾都只是在围绕自身利益互相博弈而已，“正义”“民族”“国家”不过是一个为了欺骗本国人民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无论是中共，还是高市早苗所代表的日本极右翼，无论他们如何渲染外部威胁与恐惧，都无法掩盖自身国内的深刻社会经济危机。中日两国的无产阶级理应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这两个一丘之貉的统治集团，共同建设真正属于人民的和平国度。这绝不是某些和平主义者通过几场反核游行就能实现的，更不可能靠那些幻想复兴“大东亚秩序”的中日极端民族主义者去完成。这个任务，只有那些能够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力量，即团结的、自觉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完成。

## 国际劳工的分裂与资本的“团结”

《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工人没有祖国”并非否定民族存在，而是揭示民族国家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通过民族主义从而实现了以民族利益包装殖民掠夺、以国家认同消解阶级矛盾、对工人以“同胞”概念模糊剥削关系。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解剖民族主义的双重性：被压迫民族的抗争具有进步性，但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包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素。资本的跨国流动、产业链的跨国分工，导致了如果工人斗争被锁在国界内，资本家就能用“外部威胁”“爱国动员”“排外与分工”把工人彼此对立，从而压低工资、削弱组织、提高劳动强度。



高市早苗与习近平在 2025 年韩国 APEC 峰会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敌视”是这套逻辑的典型。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官方和网络民族主义以“百年屈辱”“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为话语，频繁把矛头对准“日本民族”甚至是日本人民，从而把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满从工资、社保、工伤、欠薪等真正的阶级诉求转移到对外情绪上。2011年以来，中国劳工观察组织持续记录到大规模、常态化的工人行动，制造业、建筑、物流、平台经济尤为集中，2015年前后出现高峰，这些行动的直接原因是拖欠工资、社保侵占、搬迁裁员与外包压价。这说明真正压迫并威胁中国劳动者的不主要是“外国人”，而是中国资产阶级与波拿巴主义官僚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与此同时，中日产业链的相互嵌合一——从汽车零部件、电子、化工到稀土与装备——把两国工人的劳动置于同一剩余价值生产过程里。当日本企业把低附加值环节外包给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工厂，或把组装环节进一步迁往东南亚，压力会迅速转变为中国工人的工时延长、工资压低与用工不稳定；反过来，当中国生产率与规模优势压低整机成本，日本中小制造的利润空间缩窄，便以外包、派遣、非正规化来对冲，工人转为不稳定就业、实质工资停滞。

日本的情况同样揭示了民族主义如何服务于统治。战后到今天，日本在美日“同盟”（实质上日本成了依附于美国的“次帝国主义”国家）和驻军结构下，日本资产阶级以“安全威胁”“国家正常化”为由推动再军事化。2015年的安保法制允许“集体自卫权”，以“地区威胁”为理由拓展海外行动空间，引发全国性反安保抗议与长期的冲绳反基地运动。冲绳县2019年的县民投票中，过半选民明确反对将美军基地迁至边野古的填海工程；长期以来，冲绳承受了远超全国平均的基地密度和噪声、犯罪、环境负担。这些斗争的诉求，是要把资源与决策权从军事与财阀利益中夺回到人民手里。在劳工层面，日本的实际工资多年停滞甚至下滑，非正规就业比重高企，工会密度下降，派遣与外包渗透到制造与服务的核心环节；这并非“民族威胁”造成，而是财政紧缩、企业治理与产业外包的合力。民族主义的“安全焦虑”只是为这一现实盖上一层合法性的涂层。

现在我们把视角拉回到中国工人的日常。过去十多年，工人集体行动最常见的诉求是“要回欠薪”“补缴社保”“抵制搬迁裁员”，在多地出现因供应链重组而导致的集中裁员事件：订单波动、垫资周期延长、转单至更低成本国家使工厂通过延迟发薪、降低加班费、引入劳务外包来转移风险。这些矛盾根本上是跨国资本逐利与本地资本压榨的结果。网络上的“粉红”民族主义把真正的对立（工人与资本家）改写成虚假的民族对立（中国人与日本人），直接后果是工人组织的注意力被分散，谈判能力被削弱，行动空间被污名化，资本则在民族主义的遮蔽下继续压缩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日本工人的反抗从未消失。一战时期，物价飞涨引发1918年“米骚动”，全国超过一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粮价和资本家囤积，直接冲击政府与财阀利益；1920年代，日本工会会员数迅速增加，1921年达到约十万人，同时由工会发动的工人罢工频繁，要求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1930年代，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工会多次组织反战与反军国主义斗争，却遭到政府与财阀的联合镇压；二战时，许多日本士兵在入伍前只是普通的农民、工人或小职员，他们往往在经济困境中被迫接受征兵，例如斋藤邦雄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在东京剧场工作时突然收到“红纸”征召令，心里直呼“倒霉”，但在社会压力下只能口头说“为国尽忠”。这种矛盾心态很普遍。战时，大量士兵被灌输“天皇至上”的思想，但他们内心并非都认同。纽约时报采访的老兵清住薰四郎回忆，自己15岁就被迫上潜艇作战，许多

同伴在战场上饿死或被遗弃，他强调“绝不要为天皇或国家而死”，这是对军国主义的否定；二战结束后，日本工人每年以“春斗”的名义进行的加薪谈判在通胀走高时推动了名义工资上调，但实际工资仍常因物价上升而被“吃掉”；1960年安保斗争中，数百万工人、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反对政府强行通过条约，最终迫使岸信介内阁下台。把这些斗争与中国的工人行动放在一起看，就能看清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真正的敌人：跨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的联盟。

在缅甸、泰国、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等国家中，我们都能看到民族主义如何被统治阶级利用来分化工人阶级。民族主义并不能解放工人，不能解放人民，它在帝国主义国家成为压低工人生活水平、加强阶级压迫的工具。民族主义制造出一个虚假的“民族共同体”，让工人阶级与本国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去敌视另一国的工人阶级，从而削弱了跨国的团结。无论工人身处帝国主义国家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只要他们出卖劳动力，就同样属于被雇佣的劳动者，他们就创造剩余价值。价值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物品的“自然属性”，而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是一种社会关系。正因为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被抽象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所以不论是殖民地工人生产的原料，还是帝国主义国家工人制造的工业品，它们都同样是价值的“承担者”。殖民地工人可能消费帝国主义国家的纺织品或机械，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可能消费殖民地的粮食或矿产，但这种交换只是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和实现，而不是工人之间的相互剥削。剥削的本质在于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而不是工人之间的商品消费关系。正因为价值具有抽象性，才使得全球工人阶级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共同的被剥削地位。



全学共斗会议（1968年 - 1969年）

帝国主义确实通过资本输出、不平等交换、金融控制和军事扩张，从殖民地和附属国家攫取超额利润，并使其中一部分以工资和社会福利的形式流入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使他们在生活水平上相对优越。但这并不是工人对工人的直接掠夺，而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强加的结果。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并不是主动的掠夺者，而是被动地处于这种体系中的受益者。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并非资本

家的恩赐，而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成果。从 19 世纪的工会运动到 20 世纪的大规模罢工，正是工人阶级的抗争迫使资本家和国家让渡部分剩余价值，以维持社会稳定，所以相应的福利制度的物质基础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自己创造的，这并不能被简单的等同于“剥削殖民地工人的剩余价值”。把福利制度解释为“收买工人”，实际上是否认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并不是被剥削阶级，因为他们本身不创造价值，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体系，通过在殖民地内部剥削本国工人和农民来获取利润，充当的是中介和合作者的角色。

今天的跨国公司把产业链分布在全球，不同国家的工人其实是在统一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当资本在全球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时，所有国家的工人都会受到冲击。真正的矛盾始终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而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工人与殖民地工人之间的对立。帝国主义体系确实加深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但工人阶级在任何国家都处于被剥削地位。只有跨越民族疆界，工人阶级才能真正团结起来，打破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正如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所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性的。

## 再谈抗战和台海

80 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伟大战争，无数的人民英雄为了反抗侵略，反抗剥削和压迫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任何一个正视历史的人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给全人类带来了多么惨绝人寰的痛苦，都应该意识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是处在同一战线的。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谎言

而如今的中共却大批帝国主义旗帜，煽动民族仇恨情绪，妄想着正当化自己对他国发动战争的理由，用着“祖国统一”、“民族复兴”这样的话术为自己打掩护。台

海冲突，其根本也是帝国主义的博弈，是帝国主义者想尽一切办法来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们对台海冲突的立场参看 [《我们对台海冲突的立场：主要敌人在内！》](#)）。

与中日两国的高调对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本次事件关键当事方的台湾，却反而表现出异常低调而谨慎的态度。民进党政府一方面对日本资产阶级递来的“橄榄枝”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却又不肯轻易刺激中共，避免台海局势进一步失控。这种矛盾态度，本质上仍然是出于对台湾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考量。作为一个执政多年的资产阶级政党，民进党早已清楚，“台湾独立”这一对台湾小资产阶级极具煽动力的政治口号，相比台湾整体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集团的根本利益，早已不是那么重要了。他们面临着和中共类似的困境：所谓“独立”作为一种观念已经越发不能在现实中显露出必要性了。台湾政府想要的也不过是维持目前的状态，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如果过激地使用独立这一口号，让观念的碰撞不必要地伤及现实的秩序，那就不好了。

受到这些反动国家政府宣传的人当真以为自己在进行着什么为国为民的伟大事业。一面为百年前列强的残忍行为愤慨，却又一面为现在自己的国家是帝国而沾沾自喜。正如王朔写的那样：“一群连街边小偷，都不敢呵斥的人，却勇于高呼灭了岛国。一群连活着的人民的痛苦都漠不关心的人，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明明自己也是被中共政府压迫剥削的一员，却在这时为压迫自己的国家机器有多么强壮而挺起胸膛，甚至欢呼着想要去毁掉另一个国家中同样被如此压迫的百姓。

中共的激烈回应也好，日本政府荒唐言论也罢，这些都只不过是统治者们为了转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障眼法。现在中日矛盾的激化，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正是这些资产阶级政府转移群众视线的手段。当百姓受他们的宣传所误导，闹得不可开交时，统治阶级们正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不分昼夜地吸食着人民的劳动成果。

## 呼吁和号召

同志们，难道我们还要眼睁睁看着这些愚昧腐朽的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给自己续命而狡猾地煽动民族情绪，愚弄广大的人民群众吗？不，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日本的战争威胁，坚决反对中共的强硬回应。我们既不应该用小恶主义去衡量，也不应该胡说什么“战争万能论”欢呼着战争的到来，我们坚定地站在最革命的立场上去面对未来将发生的一切巨变。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的无产阶级们都是处在同一战线的，那就是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战线。

“主要敌人在国内”。要想真正地得到和平，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去推翻这个不断制造战争、对全人类犯下罪行的资产阶级体制。唯有革命，唯有各地被压迫剥削的无产者们意识到真正的敌人是正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并且联合起来发动革命，才能真正结束台海危机萦绕在亚太地区头上的战争阴霾。而我们必须时刻为这个目标奋斗，全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共产主义者们联合起来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VI

## 马列毛大群的百篇骂战： 歇斯底里与霸权狂热



### 目录：

- （一）“紧追穷寇”还是马拉松
- （二）演绎式与公式化批判
- （三）谁在扼杀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

### （一）“紧追穷寇”还是马拉松

一周前，共产主义革命阵线又一次被批判了。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后文简称为“马列毛大群”、“大群”）在自己的“千钧棒：炮打机会主义专辑”中在一周内发布了上百篇批判我们的骂战短文。就如同共革阵曾经遭受到的各方批判一样，我们又一次被套上了好几顶虚无的帽子：讲理论，所以我们叫“书呆子”、“西马派”、“学理主义”；讲实践，我们叫“佳士路线”、“改良主义”、“工联主义”；

组织建党，我们叫“南湖划船”、“小资沙龙”；进行宣发，我们叫“唯影响力”、“宣传主义”……一会说我们“投降派”，是中国的合作者，一会我们转身变成了“暴力冲塔”、葬送青年的莽夫，“太暴力”。当有人提问说共革阵到底是什么，他们就会含糊其辞地抛出什么“大杂烩”、“‘白骨精’”、“‘四不像’”、“黑熊精”、“混合黑暗料理”、“魔法学院”、“现代赵括”或“弗兰肯斯坦”之类的抽象概念，把政治上的批判降格为了纯粹的丑化。

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甚至回答不了“共革阵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他们说我们“在英国街头贴宣传海报”，估计是看了我们《海外支部的首批宣传——来自某英语国家》的帖子后做的猜想。其实他们如果能花个两三分钟查证下图片中出现的几个英文字母就能发现其张贴地点在美国，而非什么“英国街头”。这个错误的出现证明了要么“英语国家”这四个字是大群写手们阅读量的极限，要么是他们的世界观还停留在1776年7月4号的美国独立之前。这样的问题都在至少两篇骂战文中出现，可见其查证事实的能力如何。对于一群连英国和美国都分不清的写手们，我们相信其政治写作水平和其地理水平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在“紧追穷寇”的100余篇文章中，马列毛大群说的非常头头是道，说他们“一直忠实宣传列宁同志的政治报路线，同时也维护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并且号召革命者们“把全部的政治生命投入到真正有益于革命的全国政治报路线中去！”。应该都让同志们听听，大群的这些批评家说的有多么准确。这些批评家们讨伐着一切新兴的左派组织，“洞悉一切般”地知晓了共革阵“没有集中”、“没有政治报路线”，对我们组织的了解程度“奇迹般地”超过了组织的成员们。那么我们也想要去问问大群到底是怎样精彩地在内部执行了“列宁和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我们还想问问马列毛大群所向其读者、群聊参与者许诺了几年的那个由“全国政治报路线”建设起来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到底在哪里，而一个全国的、革命的列宁式政党又被他们通过“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建设到哪个行星上去了？

可见，大群的这些写手们、编辑们、纸上谈兵的革命家们到底是把“全部的政治生命”投身到了“全国政治报路线”中还是花在了上述列举的各项帽子和丑化之词的臆造上，答案被他们自己彻底地揭露了出来。

马列毛大群在批判我们的时候还写道：“唉，还能说些什么呢？‘共革阵’都这样了，我们还能怎么办呢？他们已经彻底无可救药，我们再劝就不礼貌了”且我们不过就是“老调重弹”，不惧什么威胁。千真万确，所以他们在一周多内一连发了100篇短文来反复地、“不礼貌”地一劝再劝好让我们不去“毒害革命新芽”，这份诚意共革阵全体都心领了。

这让我们想到了列宁曾写下的一段极具讽刺的评论：“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弗·列宁《列宁全集》第18卷）。正如如今来自大群的骂战一样，虽然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编辑们反复地说共革阵已经被他们击的粉碎，但他们还是不断地“棒打”、“炮打”、“揭开”、“炮轰”、“戳穿”我们并把“紧追穷寇”变成了一场100篇杂文的马拉松，试图用不顾质量的数量打败共革阵的同志们。

接下来，就让我们仔细看看他们这 100 篇到底做了什么漏洞百出的攻击。

## （二）演绎式与公式化批判

### 关于民主集中制与支部

在百篇骂战文中，马列毛大群反复攻击共革阵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态度，主要总结下来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泛民主”而没有集中，因此我们是在“反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首先，令人惊讶的是，大群的写手们已经越过了我们的文章内容，“奇迹般地”了解到我们组织内部“没有集中”，这些从未加入过我们组织的人竟然能够靠演绎的模式推理出这一项指控可见其想象力之强。

其次，大群指控我们的文章《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回避了集中环节的必要性，只要民主环节”并“空谈民主，反对集中”，且还判断“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尚且年幼的阶段放任自觉性不足的基层组员掌握过多的民主权力，机会主义者篡夺组织路线也就成了必然”。我们不禁思考，民主二字到底激起了大群怎样的恐惧，使其只要看到共革阵提到组织内的民主环节就吓得发抖，胡乱地指控说共革阵“反对集中”、纵容“机会主义者篡夺组织路线”。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一文中解答了，不过只会断章取义地进行公式化批判的大群写手们似乎碰巧没有引用上。在文章的第一段就提到了一个革命组织所要追求的便是能对抗和超过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组织行动的严谨程度、迅速程度、集中程度”；在关于如何落实民主集中制上，我们也做了相对应的表述：

“这里必须强调，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种抽象原则，它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组织架构中。革命党必须有明确的领导层级。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它由全党选举产生，代表全党的意志。中央委员会再从自身成员中选举产生政治局，负责处理重大决策。政治局之下设有书记处，书记处的任务是处理日常的组织事务，而不是代替政治局做出战略决策。换句话说，政治局必须主导决策，因为它代表的是全党的集体意志，能够高效而统一地制定政策。如果让书记处主导决策，权力就会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削弱党内的民主讨论和集体智慧，导致决策偏离全党利益，破坏党的团结和效能……真正的党内民主，是在充分讨论、允许少数派坚持意见的前提下，最终形成全体一致的行动。这样的统一不是表面的，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和对历史方向的共同认同之上。”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共革阵被指控的“反对集中”和纵容“机会主义者篡夺组织路线”这两项罪名被彻底地颠覆了。共革阵不“反对集中”，而是强调“集中程度”的重要性和建立“明确的领导层级”的必要性；共革阵不纵容“机会主义者篡夺组织路线”，而是强调一切观点与意见都在经受过“充分讨论”的检验后、政治局的决策主导下才会付诸行动。同时，我们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了列宁式政党下对党员纪律的要求“只有那些在日常工作中承担责任、贡献劳动的成员，才配得上享有党内的权利 [即组织内的各项民主权利]。相反，那些只挂名、不参与、不履行义务的人，就不能成为党的成员”与民主集中制的参与者。而这样的要求与方针竟被大群理解为了“小资产阶级的泛民主”和“放任自觉性不足的基层组员”，看来

其对党员身份和民主权力的持有者也有较大的理解偏差。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践是以秒为单位在组织内进行的，共革阵的组织建设保证了投票选举等民主权力和集中的组织架构之同时存在，让组织主张的“自由讨论、一致行动”从来不是什么空谈。

当然，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刻意地忽略掉了上述引文，觉得但凡一篇文章谈论民主，那就是“反对集中”，这一点我们从他们庸俗的理解中可以看的相当明白。在一篇骂战文中，大群提到：“民主集中制是什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大群对上下级关系的解释则是“下级往往存在着多数的自发同志，自觉同志只占少数，而上级代表着少数掌握着专政权的自觉同志”。这就是大群眼中的民主集中制：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运行模式，对上下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中央是如何从全党诞生的等话题便避而不谈。与我们的文章《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中提到的具体党建策略不同，大群不会回答他们眼中“列宁和毛主席一生坚持贯彻的民主集中制”里到底有什么机构、有什么程序来产生所谓的上级与中央，由此可见在他们的世界观中，上下级关系和组织内的中央是一贯存在、雷打不动且不允许质疑的，而其形成的成因更像是一种论资排辈而非明确的选举和任免程序。

如上文所述，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一看到民主二字就吓得哆嗦，实际上害怕的就是自己在有实际程序和“领导层级”的民主集中制下失去自己的位子。落到实处，他们害怕的到底是“充分讨论”、“选举产生”、“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还是民主集中制的一切细则，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最明白。

断章取义地引用只是他们骂战策略的一部分。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拉起了一套转换公式来把共革阵的理论转化成他们能够批判的对象。就如同我们先前分析的那样，我们写下的“一旦决议形成，全党统一行动”变成了“一味地实行全民民主，搞公投”、我们主张的“革命党必须有明确的领导层级”则被他们理解为了“避而不谈或者说刻意贬低集中制”。这种骂战的演绎化和公式化是由绝对的恐惧造成的，他们连直接批驳我们的理论都不敢做，得把共革阵的理论在一次次的替换、扭曲与罗织后才敢回复，还必须把引用我们的原文都画上删除线以防止直视。我们承认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和编辑们都是辛苦的，为了批判我们组织的路线，其必须研发出一条新的路线以便自己先射箭后画靶地搞骂战。

这一点从他们对我们党支部模式的攻击中清晰可见。我们在《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一文中表明“我们并非一个网站、讨论区、频道或者群组，而是立足于党支部、书记制、代表大会、政治委员会等民主集中制传统的政治组织”和“党支部是我们真正的主力，和我们的重心，一定不能把领导层这个中心当成重心来看，导致政治完全包办、基层的同志们只是旁观者而非党实际工作的承担者”。大群批判说“革命党必然是以党中央为重心，党支部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共革阵鼓吹党支部是主力、是中心，无非就是向其他泛左翼组织许诺权力分享，方便更好的联合泛左翼组织，搞南湖划船路线罢了”。我们说的党支部是“重心”一转眼就被大群改写成了“中心”，而我们说的“领导层这个中心”则又一次地在大群的批判中神奇消失了。党支部之所以是“重心”是因为其作为现实革命运动的前线和革命组织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而存在，并非是大群臆想的“向其他泛左翼组织许诺权力分享”等动机。关于这一指控我们不妨也做下戏谑的翻译：

“脊椎动物（革命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细胞（党支部），所以这是说智人（共革阵）要走无脊椎动物、软体动物甚至是单细胞生物的反革命道路，是要反转数亿年的进化，回到阿米巴原虫和草履虫的时代。”

## 关于共革阵的指导思想

大群的几位写手是如此理解我们的指导思想的：“同时将毛主席、托洛斯基（左倾）、葛兰西（改良）这三个风马牛不相及，有着重大分歧的人的思想视为指导思想”、“混合了托洛茨基、葛兰西、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毛泽东、托洛茨基、葛兰西一并挂在墙上”。还有一位甚至写道“笔者初次尝试总结共革阵思想时，便遭到了其惊吓”，因此将我们定性为“弗兰肯斯坦”。这位写手，请你冷静些、安静些，让我们好好看看这个让其遭到惊吓的“指导思想”的迷思。

其实问题的本质是无比简单的：马列毛大群的那套转换公式又开始作祟了，即我们写了三篇“思想评析”他们就将其当作了共革阵的“指导思想”。这个写作思想评析 = 当作指导思想中的逻辑断层实在是令人费解，评析只是一个中性的动词或文章类型，就像马克思评析过黑格尔、列宁评析过考茨基一样，难道在大群的写手眼中马克思将黑格尔作为了其指导思想？列宁将考茨基“挂在墙上”？

没错，共革阵曾写作了对毛泽东、葛兰西和托洛茨基的思想评析，但我们明确地表明了思想评析的目的与意义。在《葛兰西思想评析》一文中我们提到：“本文旨在简述葛兰西的理论贡献，如对知识分子的深入解释、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与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常识’、霸权装置（即精神生产资料）与‘整体国家’的关系。”；在《逝世49周年 - 毛泽东思想评析》一文中我们提到“我们重新讨论这位革命者遗产的指导性意义以及局限，他的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现实意义。”；在《八十五年之际 - 托洛茨基思想评析》一文中我们写道：“[本文]整理了托洛茨基重要的革命思想，以扩充今日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宝库，推进我们有生之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请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好好看看，以及请那位被“惊吓”到的写手仔细阅读读，这三篇思想评析中究竟是有哪篇讲了诸如“某某人的思想就是共革阵的指导思想”之类的话？

关于共革阵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中写的相当明了了：“很简单，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是革命派”。而至于我们对过去革命者的态度也有着重解答：

“我们从来就不是“某人之派”。我们对任何历史中革命者的看法都不是要“百分之四十九好百分之五十一坏就是坏，百分之四十九坏百分之五十一好就是好”这种僵硬的立场，我们拒绝将历史人物归为两大类，所谓“坏人”和“好人”，将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归为“可读”和“读了脏眼睛”的……我们坚持就事论事，不以主观对任何人的看法出发去分析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任何革命者的名字都单单不足以真正表达我们的思想。”

这也是我们写作思想评析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后续还会继续写作其他革命者们的

思想评析，请大群的写手们不要再将其错当为任何指导思想的宣言，也请那位“遭受了其惊吓”的写手不要又吓破了胆。

## 论革命条件、群众斗争与党的形成

大群的写手们在批评我们所谓“歪曲列宁主义”时，反复批评我们强调群众斗争、从改良实践到革命斗争的逐步演化和阶级意识生成的辩证过程是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甚至将我们视作是纳杰日丁式的“旧社会民主党人的遗产”。显然，这些写手们误解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与列宁都并不永恒地活在1902年或是2025年，任何革命路线都必须依据其具体的历史条件与阶级结构来建构。列宁主义从来不是一套可以脱离具体斗争环境而机械套用的路线公式。恰恰相反，它的核心精神就在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策略，把握阶级运动的客观节奏。

1902年《怎么办？》一文中，列宁开创性地强调了职业革命家、集中领导以及全国性政治报的作用。这篇文章是在一个高度压制、工人运动尚处在经济主义阶段的俄国写成的。在那时，俄国无产阶级尚未形成能够承载政治斗争的组织形态，社会主义者被迫以小圈子活动为主，革命工作主要集中在秘密组织与宣传鼓动之间。列宁在这一阶段强调政治报，不是因为他认为组织可以仅靠文字构成，而是因为，在高度压制之下，政治报是联系分散地区、统一思想方向、培育组织骨干的唯一可能形式——这是一切共产主义革命者都认同的基本纲领。

马列毛大群对我们的攻击集中在了这一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列宁对于政治报在‘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这一进程中所占据的关键地位的论断，但是我们同样也没有忘记列宁在做出这个论断前同时肯定的说法，即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有办得极好的全国性政治报也没有什么意义。”这句话让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兴奋了，他们觉得自己抓到了我们的命门并能证明共革阵“就是一百年前机会主义者纳杰日丁的徒子徒孙”。让我们再仔细地看看《怎么办？》的原文吧，列宁写道“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有办得极好的全俄报纸也没有什么意义。——这句话完全正确。但问题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大群的写手们忽略掉的便是这句话背后的辩证关系：全国的政治报是“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唯一方法，但政治报本身也需要一定规模的政治组织来负责发行与传播。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能找到一个可以与《火星报》的规模和管理模式相对应的组织吗？当列宁在1902年写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时，其要走向是1905年和1917年的起义与武装革命，而列宁当时具有的基础条件，即《火星报》本身和各有利势头在现在的中国还仍在襁褓。让我们看看《火星报》在1900年8月发表的《编辑部的话》是如何描述当时的革命形势的：

“我们正处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极端重要的时刻。近几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知识界传播之快，是异常惊人的，而与这一社会思潮相呼应的却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独立产生的运动。工业无产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向往社会主义。到处都出现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地方性的鼓动小报广为流传，社会民主主义的书籍供不应求，政府

变本加厉的迫害已阻挡不住这个运动了。监狱中拥挤不堪，流放地也有人满之患，几乎每个月都可以听到俄国各地有人被“抓获”、交通联络站被侦破、书报被没收、印刷所被封闭的消息，但是运动在继续发展，并且席卷了更加广大的地区，它日益深入工人阶级，愈来愈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俄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进程、俄国社会思想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将保证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最终冲破重重障碍而向前发展。”

共革阵要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革命情形与1900年的俄国相较不远但并不代表其完全重合。而我们在21世纪20年代所强调的“政治组织”正是一个有能力撰写刊物、制作刊物、传播刊物的《火星报》式组织且在各地区拥有自己的党支部和组织化存在。若是没有这些准备，自发的无产阶级又怎么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并在革命的理论下组织起来？我们不是马列毛大群所谴责的“反对全国政治报路线”，而是实际地在贯彻政治报路线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革命者在当时的困境是“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因此需要全俄的政治报来辅佐组织建设，而我们目前的窘境不只是没有脚手架，而是连“次木料”都不足够。

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能自信地批判正在为全国政治报做着必要准备的共革阵，也许其觉得自己的“全国网络大群聊”已经足够成熟与完备来执行“全国政治报路线”了、觉得自己的文章已经能够成功传到几亿劳动者手中了。如果事实真是如此，他们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时间来写百篇骂战文以镇压我们的不同声音了。所以说共革阵的声音置于马列毛大群之所以刺耳是因为在他们沉浸在自己幻想的甜美中时，我们挑明了他们连包砂糖都没有的现实。

在讨论过政治报路线之后，我们还想补充分析下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密室组织”的关系。当今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愈发庞大，但因为曾经发生过的溃败，其在组织上是原子化的，他们的斗争极度分散，政治表达空间被高强度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密室组织独走”的路线看似能够重建起列宁在那时的某种政治原则，但却是跳过了整个现实的组织难题，用意志代替结构，把手段当作目标。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阶级意识的羸弱和工人没有组织斗争、积累经验、形成稳定团结办法的条件。就算是在列宁那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工人阶级仅仅发动极其有限斗争的年代中，他也从未否定经济斗争的必要性。他只是指出，不能把经济斗争看作最终目的，不能把它作为革命的替代物。列宁明确、直接地将经济斗争视为工人阶级政治成长的“训练场”。难道一个没有在罢工的生产现场经历过组织锤炼的工人，能够在革命的暴力斗争中承担组织任务？一个地下革命组织正应该做的是在基层运动中保持存在，用党的基层组织机关控制与接管由改良主义发展出的自发经济斗争，并将其转化为政治斗争。就像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及的“号召，不是说一般号召，而是说具体号召，那就只有在现场进行，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到。而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显然，我们的路线从来不是将改良斗争作为终点，而是将其视为必要起点，这是我们中国革命者重建我们的进攻性武器——阶级斗争的唯一方法。在当前条件下，我们既不是要幻想一个就算是1917年都从未出现的“地下红军”，也不是要畏畏缩

缩、躲藏在所谓“高度集中封闭的政治报”幌子背后，而是必须建立能够通向那一阶段的现实道路，这才正是列宁思想的真正精髓。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扭曲群众斗争的辩证过程，将革命组织建构异化为与群众运动相分离、甚至凌驾于群众斗争之上的“先验工程”的任何恶毒思想。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上去吗？”，而许多写手们似乎只看到了“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这一部分，因此决定要将自己置于实际革命运动的千里之外，而碰巧忽略了自己应当参与到运动之中、将“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上去”这一标粗的部分。

没有群众斗争的土壤、没有同群众接触的动力，任何先锋队都只是空中楼阁；同样的，没有有着革命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党，群众的自发斗争也不会达到更高的阶段。

那么，革命组织到底是不是从密室中创造出来的？它的最核心、最重要、尽到在革命早期最迫切的产出理论、建立政党基础任务的政治报当然是一个“密室”，但是我们难道要学习中国政府，说着“共产主义永远在路上，社会主义要过渡一百年”？难道我们的革命同群众的有机结合也要等《布站》的老先生们花上一百一千年时间把每一个群众塑造成他们理想中的“地下基层组织支持者”？政党是在群众斗争与社会矛盾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在幻想与白日梦中化形的。这才是我们所理解的列宁主义——也是我们面对今天中国现实的回应。

### （三）谁在扼杀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

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马列毛大群所展现的除了幽默与低质量的内容外，还体现了目前中国左派政治中的家长式霸权。无人会否认的是马列毛大群是全国线上参与者最多的左派群聊，同样无法否认的是其数年的运营使得其领导层积累了相当多的网络政治资源：2万参与者、持续运营的发文网站“布站”和随时可被动员起来愤怒地写下百篇骂战文的写手们。许多新加入政治工作的同志们也许会在大群的规模前产生动摇，认为其群聊的参与人数证明了其政治路线的部分正确。当然，若是规模决定了政治路线的正确，那拥有1亿多党员的现代中国共产党想必也是绝对的“伟大、光荣、正确”。

这样的现实是可怕且需要被推翻的，任何新兴的左派组织若是管理、不服从马列毛大群既有的一套“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就会遭受骂战的轰炸。马列毛大群反复地尝试揭示我们的本质，把他们自己对维系家长式霸权的狂热揭露了出来。在大群的眼中，所有的左派组织或多或少、或新或旧地都和自己有着关系，因此包括共革阵在内的左派组织的一切理论产出、政治行动和斗争都不是对革命的贡献而是对他们的反叛与挑战，所以他们需要“棒打”、“炮打”、“揭开”、“炮轰”、“戳穿”一切与其“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相左的左派组织。从这样的标准再看这百篇檄文，大群无疑是成功的，大群的写手与编辑成功地让共革阵的同志们从建设列宁式革命组织的工作中抽离了部分精力、成功地减缓了对其霸权的挑战、成功地展现了自己“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的淫威。可见，在阻塞革命运动这一方面，马列毛

大群又一次大获全胜。我们都不用猜想这背后的直接受益者到底是谁了，我们也无意如同马列毛大群一样去散播什么阴谋论，我们仅叙述事实：这种左派内的骂战最为受益的永远是追求“稳定高于一切”的统治阶级，即现代中共政权。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各战线中工作和学习的同志们、本频道的读者同志们、各仍在观望态势的新兴左派组织们，是时候向这样霸权式的“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说不了。我们将不再接受一个毫无组织性与实际工作的、为骂战而生的团体盘踞着话语权；我们将不再接受一批只会复读理论却连其精髓都未曾把握的团体利用其积累起的政治资源打击异见；我们将不再接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被这样的团体代言与绑架，最终走向僵化和溃烂。

**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们，组织起来！**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经典导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革命年代里，反革命与革命轮流登上舞台，社会各阶级拼死争夺社会的主导权，动荡成为了持续的“常态”。但历史却喜欢捉弄人，我们看到了荒谬而又真实发生的一幕：正方和反方最终都没有赢得胜利，运动戛然而止，变革被秩序替代、前进被倒退侵蚀，社会一切群体都沉默下来，能力低下的“野心家”却登上历史舞台，用穿着制服的士兵以刀剑建立自己的统治。

任何政治力量在篡权者的淫威下都土崩瓦解。人们不理解，何等出奇的意志力或人格魅力，能让这种德不配位者轻松窒息所有声音！人们不明白，面对这种“强人”的崛起，为何一切反抗都是如此无力，仿佛终结动荡的专制者就是历史指定的“接班人”。

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1851年就是这样在众人的震惊中发动了政变，镇压了1848年开始的法国二月革命，终结了短暂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的共和主义者、保皇党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都无法找出自己溃败的原因——剩下的只有无力的哀嚎，对波拿巴绝望的咒骂。在行动的相似性上，他们称得上是制作传播习近平的迷因外就无所事事聒噪者们的前辈。



1851年政变的巴黎街头

但马克思认为发泄无助于理解。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历史唯物主义的杰作中，马克思科学的分析了局势的成因，将这段历史从“英雄”与“反派”的扮演游戏和机械的“程序式发展”的泥潭中拯救了出来。马克思说：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恩格斯于1885年则回顾说：

“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发表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可以从这部经典中吸取很多宝贵的教训。在我们的时代，前文所说的雨果和蒲鲁东式的历史观，仍然迷惑着相当多的头脑。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要么被夸大，要么被贬低。我们希望同志们能不是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而是在阅读此书后，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

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

## 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

伟大的思想不会诞生于虚无之中，思想家们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收到时代的制约，反映了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评判古代人，不然一切都会显得十分荒诞。亘古不变的价值观和善恶标准只能是后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将历史变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不是去真正地理解它、从中学习。他们把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革命的内容打成“机会主义”、“反动派”、“假革命”然后批成一文不值的垃圾，上下几千年的文献、艺术、建筑被指责为封建糟粕、需要物理意义上粉碎的“反革命”——像极了一群想起自己6岁作出的蠢事原地跺脚的12岁小孩。不愿意正视过去，更不可能有前进的勇气：连亡灵都怕，那活着的敌人还如何应对？我们说，历史是“继往开来”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今天的世界不是凌晨新建立起的，而是昨日的世界发展而来。后人不是“彻底抹除”或者“全盘继承”前人的传统，而是在前面奠定的物质基础下前进。个人无法为所欲为去跳出客观环境的限制，极左派向来无法理解这点。在他们看来，只要口头上否认了过去，一切事物就变成了“崭新”的创造：无政府主义者不认为国家政府的存在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性产物，而是道义上“邪恶”的压迫性机构，也不去科学地思考它如何在发展中被淘汰，而是扣上书本拿起燃烧瓶向自己的肾上腺素投降。马克思这样形容前人与后人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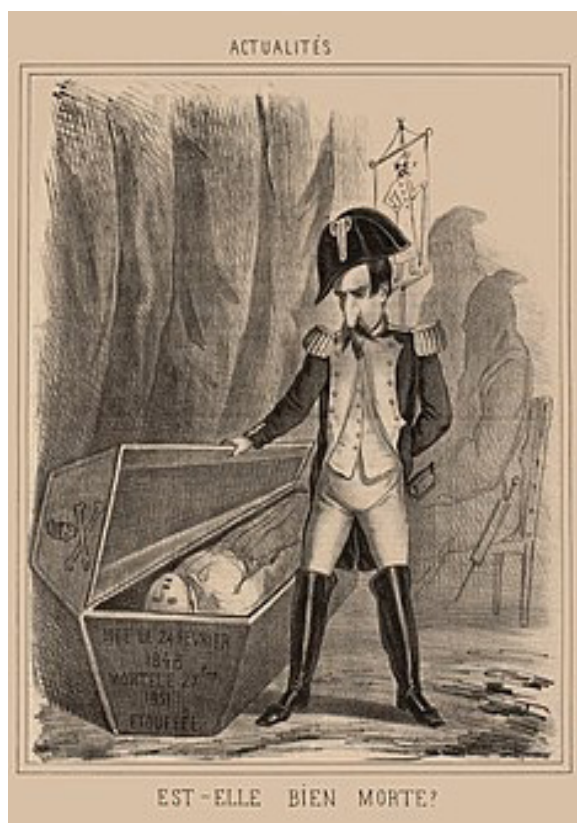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历史跳跃、颠簸着前进，绝不是如同简单的函数一样笔直而单调。人们不是循规蹈矩地接受过去，而是不断地否定过时的事物，合理的变成不合理的，而不合理的又被合理的所代替。人们从旧的遗产中提取出新的内容，即使这个内容是和遗产相互矛盾的。比如，人们常将“文艺复兴”视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崛起的萌芽。先锋们翻出奴隶制社会的艺术，并不是想要重建罗马帝国，而是将其服务于建立资本主义新秩序；拙劣地从历史中照葫芦画瓢肯定做不出事情，马克思比喻到：

“就像一个刚学会外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中国许多的革命者现在就深受这种“照葫芦画瓢”思想的毒害。他们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任何观点，无法从现实中提取信息进行思考；他们只懂得从古书里找到合意的句子，然后背下来痛斥中国政府；他们每日都忙于争论谁才是最“合法”、“正统”的前人的继承者，穿着前人的衣服仿佛自己就有了前人的能力……历史的连续性坚决否认这种做法，我们所要连续，绝对不是“原地踏步”。马克思在书中教育说：

“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

## “螺旋式上升”

法国 1848 到 1851 年的发展很难不让人觉得历史发生了“倒车”，革命的一切都化为了乌有。帝王又一次回来了，政治自由又一次被查封了，街头又一次被大兵所控制了。马克思形容说：

“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

民主制、代议制、国会、总统……所有这些粉饰都被逐个粉碎，国家机器以最赤裸

裸的形式进行统治。这代表之前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吗？这代表1848革命的成果都被收回了吗？马克思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阶段性的失败和倒退是历史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换言之，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它发展的规律像社会、自然等一切地方看到的一样，不是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不断上下波动、长期显示向上增长的一个趋势。革命和反革命你来我往推动着社会发展向前，将视野放远观察，哪怕是短期内的倒退也阻挡不了全图上升的旋律。这个旋律是曲折的，就像爬山路、像弹簧的纹路一样。

苏联解体的这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媒体用尽一切办法宣传共产主义“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急不可待标志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是资产阶级的恐惧：他们清楚革命的低潮不代表历史的终点，而是下一个高潮的前夜，便不得不拼尽全力去塑造成见、攻击对手。这种断章取义，像极了拿着股市单日的涨幅作为依据论证“经济趋势”一样愚蠢。

这种螺旋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中非常明显。很多时候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会说，思想固然美好，但所有尝试的历史都太不堪了；我们反对以此得出社会主义只是“空想”的结论。共产主义者指出，这恰好说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条件除了客观的经济发展外，对人的主观引导的要求十分之高，它不能和以往的其他革命混为一谈，而是最为深刻、性质不同的一场变革。对于人类来说，它甚至是一种“试炼”：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不会是顺产，反而会像难产一样艰难。要不进行努力、错失了机会，那“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第二个选项就会成为不幸的未来。

资产阶级革命前，资产阶级有几个世纪积攒自己的财富、文化并建立起思想的统治。他们以压迫者队伍一员的身份去反对旧日的压迫者，在政治上成为统治阶级前，早在经济上占据了优势。无产阶级革命和历史上曾经伟大的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工人群众是以彻底的被压迫者的身份去反对社会上的一切压迫者，在夺取政权前他们没有任何方法建立自己经济上的统治，因为恰好是资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人为塑造了无产者的赤贫；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唯一改变命运的方式就是通过革命。

所以前人们、现在的我们所走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极其曲折和艰难的。我们不仅目睹了社会主义因外部压力土崩瓦解、惨死在军靴之下，更目睹了从内部发生的一次次背叛。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基础，创造了自己被推翻所需的必要矛盾，还提供了消灭自己的掘墓人；但这些条件不会“自行”将人类社会过渡到下一阶段。在目睹社会主义革命未来遭遇的挫折前，马克思就这样预测了革命螺旋上升的特点：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

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

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当学习、总结曾经的历史经验时，必须围绕寻找这条“螺旋上升”曲线的主题展开。我们不因曾经的失败气馁，也不变成自我欺骗、顾左右而言他的回避者，不去承认客观发生的不利事件，反而只是日复一日吟唱“资本主义也是这样”。

## 波拿巴主义

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政治只有简单的“独裁”与“民主”两种形式，他们从来无法解释一点的是：如果民主是如此的神圣和高尚，那独裁者们都是何等“天选之子”可以逆潮流独揽大权？独裁者的产生只剩下“军事力量”一个解释，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出自平民家庭的士兵去支持不受欢迎的大统领？自由主义的解释走得越远，就越像一门玄学。

马克思则从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和冲突中寻求答案。他认为，造就任何政治局势的，从来不只是伟大的个人，而是社会各阶层之间冲突达成的“平衡”。独裁者如果没有必须的环境，只会沦为历史中的笑谈。马克思认为的独裁的土壤是什么呢？

社会各阶层既然将权力交给至高的个人，就代表了他们自己无力承担统治的任务。换言之，是社会各阶层在持续的冲突中都伤亡惨重、无人可以从成为彻底的“赢家”，但社会又不能一直处于毁灭性的混乱状态中，便找出这种“伟人”成为仲裁者。路易·波拿巴作为典型，被马克思评论道：

“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亵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

波拿巴就是这样玩弄着社会中那脆弱的平衡。其执政依靠的并不是“自己阶级的力量”，而是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他不得不在拉拢一群人的同时去打击另一群人，明天再把政策反过来执行一遍。他要用一切方法把国家机器本身提升到高于社会之上的地位，给予自己的统治一种虚幻的“独立感”和“中立感”。

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政府力图在资本家和劳动群众面前都将自己伪装成自身

利益的守护神。今天他清剿马云等大资本，明日他的军警逮捕示威的讨薪工人。任何社会力量，但凡要构成独立的组织、提出独立的纲领，都被他视为头等大敌；任何个人和集体，如果侵犯了正头的稳定，都将被他追杀。这种波拿巴主义最终又不得不依靠资本主义制度的土壤生长，将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变为“被管家踩在脚下的主人”。



法国的 1848 年革命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描绘的世界离我们并不遥远，也不只是研究历史的消遣。我们真诚向所有愿意了解那段历史、学习马克思分析方法的革命者们推荐这本书。希望导论可以帮助同志们带着问题进行自己的阅读。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

作者：韩麟



当人们谈论“人道主义”与“和平”时，总会认为它们似乎超越了阶级、民族和历史条件，代表着人类共同的善意与追求。人道主义意味着对苦难的同情与关怀，和平则象征着没有战争、没有流血的安宁状态。在日常生活中，这两者常常被当作文明的标志，被视为人类道德的最高体现。然而，马克思主义提醒我们，任何道德观念都不是悬浮在历史上空的抽象原则，而是深深植根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所谓“人道主义”和“和平”，虽然在表面上具有普遍性，但在阶级社会里，它们往往承担着掩盖现实矛盾的功能。人道主义如果脱离阶级关系，就会沦为空洞的说教；和平的实现如果是基于剥削制度的，那也只会成为慢性暴力的一种形式。

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指出，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慢性苦难”。在任何一种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迫使劳动者付出生命与时间，以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劳动者被迫出卖劳动力，整日耗费在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他们创造的财富被统治阶级攫取，而自己只能得到维持生存的最低条件。这种剥削不仅夺走了他们的体力和精力，还使他们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异化，生命被消耗在无尽的重重复劳动中。所谓“和平时期”，并没有让这种苦难消失，相反，

它只是让这种苦难以更加制度化、合法化的方式持续下去。阶级统治的暴力并不总是直接以刀剑、枪炮和鲜血的形式出现，它更多时候是以契约、赋税、市场竞争、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的形式存在，看似自然且合理，却在日复一日地消耗劳动者的生命力。

因此，这种“和平”的本质，就是一种以制度化、慢性暴力为基础的“剥削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统治阶级通过宣扬“人道主义”的抽象温情和和平的表象安宁，来模糊和掩盖这种持续性的慢性苦难。人道主义的慈善行为往往只是对剥削制度产生的苦难进行“创可贴式”的修补，而没有触及苦难的根源；阶级社会的“和平”则是一种用契约和法律粉饰的、对劳动者生命力的系统性榨取。

这种现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尤为鲜明。日本和韩国的“过劳死”现象表明，工人并不是在战场上倒下，而是在办公室和工厂里被透支生命。欧美国家的劳动市场灵活化与平台化制造了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他们缺乏社会保障，长期承受心理与生理的双重风险。但如果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类似的慢性苦难在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同样存在：农奴在土地上被迫无休止地劳作，奴隶在矿山和庄园中被耗尽生命。



炮击下化为废墟的加沙城

同时，这种慢性苦难往往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被自然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统治阶级都通过宗教、教育、道德或媒体不断灌输一种观念：顺从是美德，辛勤劳动是天职，服从是幸福的前提。资本主义社会则以“努力工作是美德”“灵活就业是自由选择”的口号，让工人把自己的过度消耗视为正常甚至值得骄傲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所谓“普通人的生活”常常被抽象化、理想化为一种平凡、温馨、没有责任的轻松日子，仿佛只要远离政治与斗争，就能安享幸福。然而，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普通人的生活从来不是这种浪漫化的图景，而是充满了被剥削、被压迫和被消耗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往往正是最先被政治和斗争所吞没的牺牲品。战争爆发时，他们是被征召上前线的士兵，是被轰炸摧毁家园的平民；在“和平时期”，

他们则是被剥削制度下被透支生命的工人，是在经济危机中最先失业、最先陷入贫困的群体。所谓“远离政治”，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只是幻觉，因为政治和斗争无时无刻不在塑造他们的命运。正是这种幻觉，使得他们在被消耗时缺乏抵抗的准备，把自身的苦难误以为是自然的、永远不可避免的生活常态。

事实上，战争并不是偶然的灾难，当阶级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无法再通过日常的“和平”机制加以维持时，它就会以战争的形式集中爆发。古代帝国发动战争，并不是出于所谓“文明使命”或“民族荣誉”，而是为了掠夺土地、奴隶和财富，以满足统治阶级对剩余产品的无止境需求。亚述帝国的远征依靠贡赋和奴隶掠夺，亚历山大帝国的东征则是为了攫取东方的财富与人口，以维持其军事机器和统治集团的利益。换言之，战争的物质基础始终是统治阶级对资源和剩余的追逐。正如德国的兵学家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乃政策在特殊方法中的继续。”在阶级社会里，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核心事实：战争始终是统治阶级政治的延伸，是他们为维护 and 扩张统治而采取的极端手段。

正因如此，许多著名作家都揭示过战争的真实面貌。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写道：“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会对战争怀有幻想，把它想象成骑士的冒险。但等你真正见过战争，你就会明白，它不过是屠杀、肮脏和愚蠢。”雨果更是直言：“战争是什么？就是屠宰场。年轻人被送上战场时还在载歌载舞，而他们的母亲却在哭泣。”这些话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苦难之间的区别：在和平时期，劳动者的生命被一点点榨干，苦难是隐蔽的、制度化的，是慢性消耗；而在战争时期，这种苦难则以最赤裸的形式集中爆发，化为血与火的大规模屠杀，是急性毁灭。二者在形式上不同，但在本质上同样源自阶级统治，只是战争将平日里潜藏的矛盾以最残酷的方式集中展现出来。

正因为如此，有人提出另一种看法：既然战争能把矛盾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么它就可能成为群众迅速觉醒的契机，让他们看清统治阶级的丑恶，从而爆发革命。表面上，这种观点似乎合乎逻辑，但它忽视了战争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摧毁作用。因此，共产主义者从不认为战争本身能够自动带来革命，相反，战争恰恰会摧毁革命。恩格斯早就提醒过：战争可能加速矛盾的爆发，但它既可能催生革命，也可能摧毁革命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表明，战争带来了数千万人的死亡和苦难，却并没有自动转化为普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相反，战争往往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造成毁灭性打击。原本在不同国家并肩斗争的工人，在战争中被迫穿上军装，以“民族”或“祖国”的名义走上战场，转而拿起武器互相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例子：德国和法国的工人，昨天还在国际工人运动的集会上高呼团结，第二天却在战壕里互相开火。同时，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的宣传把阶级矛盾掩盖起来，使工人相信他们是在为“国家利益”而战，而不是为资本家的市场和殖民地去送死。更为严重的是，统治阶级往往借战争之名进一步打击工人运动和民主权利。以“国家安全”和“战时需要”为借口，资产阶级政府可以宣布戒严，禁止罢工，取缔工会和工人政党，监禁革命者，甚至暂时关闭议会，加强对媒体的审查。工人阶级在和平时期尚且有限的政治空间，在战争中被彻底压缩，任何反战的声音都可能被指控为“叛国”。这样一来，战争不仅在战场上屠杀工人，还在后方摧毁他们的组织和斗争工具，使阶级意识被双重压制。帝国主义战争不仅夺走了无数工人的生命，更摧毁了他们的阶级意识，把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化为维护

统治阶级利益的牺牲品。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战争，并不是出于抽象的和平主义情怀，而是基于对工人阶级运动和阶级意识的形成的考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能够以革命战争阻止帝国主义战争，当然优于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再被动地进行革命。正因如此，革命党人必须在平时时期积蓄力量，建立坚强的组织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以便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能够提出革命的纲领和任务，领导工人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假设在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在资产阶级国家宣布独立的工人组织非法、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掩盖阶级意识的条件下，找到新的斗争路径。首先，共产主义组织必须要继续在非法的条件下不断揭示战争的阶级本质，指出它是资本家为市场和殖民地进行的掠夺，反击“保卫祖国”的反动口号，唤醒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使他们认识到真正的敌人是本国的统治阶级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其次，要在工会和政党遭取缔的情况下，建立地下组织和秘密联络网络，以小组化、分散化的形式保存斗争火种，并在工厂、兵营和社区中开展革命的反战宣传。再次，要利用战争加剧的统治阶级危机和群众苦难，推动罢工、抗议、兵变等斗争，把被迫的牺牲转化为自觉的斗争。列宁所强调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战争”，正是要求革命党在战争中揭示革命形势的深度，组织群众开展反战斗争，并建立适应革命需要的工人组织形式。只有通过这种积极策略，才能在战争的破坏中保存并发展阶级意识，把战争的痛苦转化为推翻旧制度的力量，最终以革命的胜利引领人类走向持久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员

正是在这种战争与和平的双重苦难背景下，那些看似温和的“和平国家”论调才显得格外危险：有人认为，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不断研发新武器、维持庞大的军备，才保证了“我们没有生在和平的年代，但生在了和平的国家”。他们要求人们歌颂那些“替我们负重前行的人”，并强调要“将心比心”，因为“我们的日子总归比那些战争中的人和替我们负重前行的人过得好”，因此必须“珍惜和平”。这种说

法表面上似乎合情合理，实际上却与前述的意识形态自然化逻辑相互呼应，共同掩盖了现实的剥削关系。所谓“和平国家”并没有让劳动者免于苦难，他们依然要面对过劳死、贫困化和制度化的压迫。军备扩张和武器研发并不是为了保护普通人的生活，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维持统治和扩张利益的工具。把这种政策包装成“替我们负重前行”，只是让劳动者为统治阶级的利益买单。更重要的是，这种“将心比心”的劝说逻辑，把劳动者的处境抽象化为一种“已经足够幸福”的状态，暗示他们应该知足，而不是去质疑制度本身。这样一来，现实的剥削与压迫就被合理化，斗争的意志被消解在一种虚假的感恩之中。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所谓的和平必须依赖于不断的军备竞赛？为什么劳动者的安全感不是来自社会制度的保障，而是来自统治阶级的武力威慑？所以，真正的和平不是统治阶级赐予的恩惠，更不是军备扩张的副产品。真正值得珍惜的和平，不是这种以慢性苦难为代价的“和平国家”，而是通过工人阶级斗争建立起来的、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因此，那些“和平主义”者或歌颂“平凡生活”的人，往往忽视了事实：和平并不意味着没有暴力，平凡也不意味着没有苦难。在阶级社会里，和平只是统治秩序得以稳定运作的条件，平凡生活则往往是被剥削关系遮蔽后的幻象。真正的解放，不在于抽象地赞美人道与和平，而在于揭示并改变这种制度化的苦难，使人类的日常生活真正摆脱阶级统治的桎梏。

这种试图用抽象道德来消解阶级矛盾的逻辑，不仅体现在对“和平”的盲目歌颂上，也同样贯穿于所谓“人道主义”的思潮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人的解放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道德的、心理的诉求。一旦人道关怀脱离了对阶级统治的根本批判，它就必然沦为一种廉价的同情，一种无法触及矛盾的现实基础的空洞说教。青年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曾用人道主义的语言来批判异化劳动，但他很快意识到，如果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人性”层面，就无法揭示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苦难的根源，因为人的本质从来不是某种抽象的道德属性，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不触及对阶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批判，那么人道主义就会沦为空洞的说教。历史上那些打着“人道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潮，往往把工人阶级的斗争消解为普遍的道德诉求，把阶级矛盾替换为抽象的“人类苦难”，结果只能在政治上为小资产阶级的妥协立场服务。这样的“人道主义”非但不能解放人，反而成为统治阶级维持现状的工具。更有甚者还发展出一种理论，即认为“斯大林主义”之所以会产生，之所以带来灾难，是因为缺乏“被革命化的人道主义思想”，仿佛只要在革命中注入更多道德关怀，就能避免官僚主义和暴力的发生。这种看法不仅误解了斯大林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使得工人阶级的阶级统治摇摇欲坠，只能通过专制制度维持），更是把历史的失败归咎于“道德的缺席”，而不是客观的阶级力量对比。

有人认为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是所谓“人道主义”或“人道社会主义”的代表，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立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把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核心，而不是诉诸抽象的“人性”或“普遍道德”。托洛茨基在《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中尖锐批判了这种倾向，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普遍道德”只是维护既有秩序的工具，而工人阶级的“革命美德”只能从推翻剥削制度的历史任务中获得意义。他明确写道：革命者的道德标准不是抽象的善意，而是“有助于无产阶级团结、提高其斗志、推翻资本主义并解放人类的一切手段”。因此，道德说教不能

替代政治斗争，谁用抽象道德来取代阶级政治，谁就为反动开路。

罗莎·卢森堡同样拒绝用道德语言来取代阶级分析。在《社会改革还是革命》中，她批判那些幻想通过渐进改良实现“更人道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她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的修补，而是对其根本的否定。她也指出，改良主义者试图仅仅通过议会立法、社会改革等手段逐步改善工人状况，却回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革命性批判。这种立场在她看来是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背弃。同时，卢森堡的那句“自由只为支持政府的人，那就不是自由。自由就是为持不同意见者的自由”，常被误解为抽象的人道主义宣言，仿佛她是在呼吁抽象的普遍的言论宽容。但实际上，她是在批判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压制工人阶级政治表达的背景下提出这一观点，强调的是工人民主的必要性，她捍卫的不是超越阶级的道德自由，而是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必须保有的政治空间。

同时，她并不否定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作用。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明确赞赏布尔什维克在极端孤立、战争摧残和国际背叛的条件下仍敢于夺取政权，并指出他们“在历史可能性的限度内做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所能做到的一切”。她强调，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必须区分本质与偶然，不能用道德标准去评判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她看来，“在这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是唯一能用胡登的话高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他们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夺取了政权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实践问题，他们在全世界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决战大大向前推进了。在俄国只能提出问题。问题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得到解决。在这一意义上说，未来是到处都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

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人道关怀，并不是诉诸普遍的善意，而是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使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现实的历史结果。人的解放不是抽象的道德目标，而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因此，那种所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本身就是多余的。它往往把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理解为一种抽象的道德姿态，而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制度变革基础上的现实关系。在工人民主制度下，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并不是外加的修饰语，而是制度本身的内在逻辑：当剥削被废除、当生产和政治真正由劳动者掌握时，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就不再需要被额外强调了。

当然，共产主义者并不否认类似联合国、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在某些具体场合下的人道救助作用。它们在战争、灾难和饥荒中提供了救济，减轻了部分人的痛苦。然而，这些机构本身的阶级属性和局限性同样明显。联合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真正平等的国际组织。它是在二战后由战胜国主导建立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制度让五个大国握有否决权，这意味着全球重大事务往往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所谓“国际公正”；红十字会虽然打着“中立”和“人道”的旗号，但它的历史同样与欧洲列强的外交和军事利益紧密相连。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这种“中立”往往意味着对帝国主义强权的默认。更严重的是，这些机构内部长期存在腐败丑闻。比如，联合国在2004年爆发的“石油换食品”丑闻，被认为是其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涉及秘书长安南之子及多名高级官员，他们利用项目牟取私利，导致数十亿美元资金被侵吞。此外，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多次被曝出性侵、贪腐、吃空饷等问题，

显示其管理体系的严重腐败和不透明。红十字会同样如此，它在中国、欧洲多次爆出腐败丑闻：例如 2020 年武汉疫情期间，湖北省红十字会被曝光将大批紧缺口罩分配给并非一线医院，引发舆论哗然；2018 年云南普洱市红十字会出纳李艳萍挪用救灾款 247 万元，用于个人消费；2023 年短短三天内，包头、厦门、哈尔滨三地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相继落马，媒体直言这是“假慈善，真腐败”。



### 屡次爆出挪款丑闻的中国红十字会

因此，真正的解放只能来自工人阶级自身的斗争。只有当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异化被彻底消除，只有当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才会从口号变成现实，而所谓“人道主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民主集中制的主观条件

作者：方白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组织原则，是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过程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革命者面对的是一种强制力，资本主义的强制力。资本主义在每一个角落都生根发芽，不止在物质世界中，在精神世界中资本主义也在每一个头脑中盘根错节。革命者也需要另外一种强制力，这种强制力需要强大到与资本主义的强制力抗衡。要做到这种程度我们的党员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过来也会要求我们的党员在思想上、主观上有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认识，我们不是盲从于一个抽象的组织原则，我们要真正的理解民主集中制为何是重要？

## 一、党员首先应当理解为何要集中

首先无产阶级就是要求强制集中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的主体，不是单个人的，也不是特定的某一群体。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个人或者特定的团体他们只是无产者或者一群无产者，只有当无产者将自己的力量、意志投射到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中，只有无产者将自己的从个人的、局部的、有时候比较狭

隘的诉求升华为所有无产者共同的意志时，他们才是无产阶级中自觉（拥有阶级意识）的一员。如果相反无产阶级的意志被分散了，无产阶级就会被各种意识形态所分化，他们变成一群无力反抗的被资本主义统治的无产者，被市场经济倾轧成活生生的生产原料。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集中化的表现，也应、而且是更加应该集中的去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如果党自身就是一种分散的，宗派林立的，这样的党是无法带领无产积极走向胜利的。

既然我们明确了无产阶级和党的集中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那就必须指出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当今中国的左翼青年中十分常见。他们认识到了独木难支，于是加入了一个团体。但他们发现这个团体与他们之前的设想有出入时，退出组织就成为了常见的结局。我们需要认识到所谓退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便是组织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比如缺乏民主讨论、集中领导或正确的路线，这负面地影响了成员对革命事业的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若是革命者意识到通过内部的改革和沟通已经无法纠正组织的错误路线时，就有必要在该组织内发起公开的呼吁并在组织外积极寻求重建或联络更有生命力的组织。第二种情况则是成员个体层面的问题，相较于第一类情况，其成因会更加的分散且复杂但大都可以归结到两类较底层的诱因：第一，组织内的工作和革命事业本身与自己的个人生活产生了冲突；第二，虽然组织有完备的、民主的沟通渠道与机制，但因各类原因自己拒绝沟通。通常，基于这两类诱因选择退出组织的成员往往还会强调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和对建立列宁式政党的坚持。但是，规避充分的辩论与讨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持有的态度，而不选择使用民主集中制下的沟通渠道发声也违背了列宁式政党的基本机制：讨论的公开化和行动的一致性。

最重要的是，他们没能理解无产阶级和党为什么要集中，他们认为自己退出党或者还依然在保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初心，坚守共产党人的原则。但他们的退党行为本身就是违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基本组织原则。“口头上宣扬自己仍然支持共产主义思想，实际上溶解在你的职业、你的生活、你的家庭这样的琐事之中。”

## 二、认识民主不是抽象的形式，是形成统一意志重要过程

共产党人的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不是僭主的集中，换句话说先锋队的集中是经过民主讨论后的集中，是统一思想后的集中。也就是“虽然在讨论一切问题时我们持有自己一定的观点，但是，我们决不反对同志之间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为了弄清目前各种意见分歧的深度，为了全面讨论争论的问题，为了同革命运动中不同观点的代表、甚至不同地区或不同“职业”的代表不可避免的走极端现象作斗争，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公开开展论战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列宁全集《火星报》编辑部声明）。



### 列宁联合创办的左派报刊《火星报》

民主集中反过来要求我们的党员在主观上认识民主不是抽象的形式，不是资产阶级无法调和矛盾后被迫用多数人的意见去压制少数人意见那种畸形扭曲的民主。先锋队或者党的民主是形成统一意志的必要过程。

在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要求每一位同志将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毫不保留地发表出来，将所有的分歧都摆在公开的场合中进行讨论、辩论乃至论战。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在思想碰撞中达到统一，锻造出坚强的集体意志。随后，我们必须毫不保留地去贯彻执行这一集体意志。这不仅是组织原则，更是革命纪律的体现。这里会出现一种机会主义的行为，某些同志在正式会议中缄口不言，不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等到集体意志付诸执行时，却暗中抗拒、阳奉阴违；事后又辩解称自己在公开讨论时有所保留，或因为担心少数意见不被支持而选择沉默。这种保留行为，正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它破坏了民主讨论的纯洁性，动摇了集体意志的权威性，必须予以彻底批判和清除。

在民主讨论的正式会议上，这些同志表面上保持“和谐”，不发一言，仿佛一切都已认同。他们的沉默并非出于谦虚或深思熟虑，而是源于内心的算计和畏惧。他们害怕自己的观点与多数相左，担心成为少数派，影响个人在组织内的地位和评价。于是，他们选择明哲保身，将分歧隐藏在心底，任由会议在表面一致中草草结束。这是一种缺乏革命者的坦荡胸怀和坚定意志的表现。列宁就尖锐指出，机会主义者总是“在原则问题上退让，在实际行动中捣乱”。这种在会议中不表达、在执行中抗拒的行为，正是机会主义在民主集中制中的体现。这是对党组织原则的背叛。

另外，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该同志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却在公开场合保留下来。这是一种极度自私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既然认为正确，为什么不勇敢地抛出来，通过论战澄清是非、统一认识？如果正确的观点被少数人垄断在私下，而放任多数人的决定走向错误，这是对组织的背叛。他们担

心自己的观点得不到支持，怕被其他同志反对，这暴露了他们内心的个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从不畏惧少数，甚至在孤立时也要坚持真理，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二种情况：如果该同志明知自己的观点是错误（或者是模棱两可）的，却仍选择在公开会议中保留（不批判、不肯定，作出一些模糊的判断）。这同样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只不过更添一层虚伪和怯懦。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不想接受教育。民主讨论不仅是统一正确意见的平台，更是帮助成员克服错误的熔炉。如果错误观点被隐藏起来，不仅该同志无法得到及时纠正，还会污染集体氛围。事后，当执行集体意志遇到阻力时，这些同志又跳出来抱怨“保留了意见”，这是推卸责任的狡辩。他们怕被批判会降低自己在党内的评价，怕影响“前途”或是“自己的心情”，这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习气的集中体现。

不管是哪种，在公开会议中不坦诚表达自己的意见，都是机会主义的。坦诚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毫不保留地贯彻集体意志是党员的义务。

总之，实行民主集中制要求我们党员认识到集中意志才能在艰苦且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坚持下来，集中意志才能以整合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中应当是民主的集中，在公开的会议中要毫不保留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共产党人只有这样形成的统一意志才能带领无产阶级完成前人未竟之业。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停止那教师爷般的颐指气使！揭露大群对群众运动的“公式化污蔑”

作者：杨袭



每一次出点大的动静，军警还没计划好下一步的行动，就先有那么一批“革命家”早早搬出来了自己的公式，向“无知的群众”发起自己那神圣的批判。“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面对中国的群众运动，只要看到人们不是举着毛泽东的画像上街、不是高喊着“建立地下红军”“政治报路线万岁”，不和他们一样称呼中国政府叫“中修”，闻起来不是自己的味道，就义愤填膺在键盘上敲出错字连篇的社论，攻击可恶的“自发性”。

曾经江油那一次就是这样，现在海南琼中同理。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比中共更希望看到群众的溃散和失败，因为群众但凡从斗争中取得了一点成果，就是对他们理论和路线的直接证伪。马列毛大群所有“分析”的社论都可以简化成这种八股文：

1. 简单介绍下发生了什么。
2. 引用几句毛泽东的话。
3. 说群众是“自发斗争”，属于冲塔，没有意义。说推翻不了资本主义体系。

#### 4. 结尾说“地下红军”、“政治报路线”、“准备战略反攻”几个关键词。

就这样四个要素不经思考混合起来，变成了这批“革命家”的产出。他们这种冷眼旁观、自作高明的愚蠢，主动将革命队伍与劳动群众进行了隔绝。在文章中，马列毛大群写手这样评价海南农民对公司的抗议活动：

“砸的烂资产阶级的车，砸的烂资产阶级的招牌，却砸不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砸不烂资产阶级政权，砸不烂无产阶级悲剧与痛苦的根源，这正是自发斗争的局限性。”

理论上，这点是毫无疑问的。缺乏组织、明确政治纲领的群众自发斗争，虽然容易因为突发的事件点燃积攒已久的怒火，但这怒火来的快去得也快。面对有计划有力量的敌人，这种斗争无法真正消除矛盾，人们往往在妥协后逐渐散去。

编者按：

1、向展现出冲天气概的斗争群众致敬！但是，琼中运动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仅仅是一次失败的自发经济主义反抗。在赵修工业化的镇压力量面前，泛左翼所鼓吹的地上公开冲塔路线完完全全是反动的。没有组织的群众在警察武装面前只有挨打的份，可见，这条路线只能带来人民群众无意义的牺牲，而不可能打倒资产阶级的统治。人民群众迫切地需要正确路线的领导，需要革命的组织。这就要求革命者按照政治报路线建立地下革命家组织，建设全国性地下斗争网络，派出代办员建立地上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和义务劳动组织起群众，筛选先进分子引流至地下，壮大地下暴力和地下力量。有了正确的领导，地上群众就能以自觉的抗争来回击资产阶级的压迫，地下红军则通过地下斗争削弱资产阶级力量，进而扭转阶级力量对比，直到彻底推翻资产阶级专政。

2、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资本主义的制度就导致结构性的压迫，这种压迫随着帝国主义走向崩溃而越发深刻激化，群众的反抗也自然风起云涌，越发高涨。但这种自发性斗争，永远是有局限性的，只有在先锋队领导下的斗争，才是真正的革命活动。这要求先锋队更快的建立自己的地下政权，通过地下领导地上，发展起真正汪洋大海的地上斗争。

#### 摘自马列毛大群的“从海南琼中群众运动到马列毛主义的正确革命路线”

事实上，不只是群众的抗议活动，哪怕是工人阶级组织的罢工，如果不上升至总罢工、进而组织共产主义革命，那都只是一种暂时性、防御性对抗资产阶级的手段。这点按理来说应该是共产主义者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除非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工人国家，那一切斗争取得的成果都将被左手给出、右手收回。

但马列毛大群是真的想要指出这种自发斗争的“局限性”，进而在未来的运动里对其进行组织、提升劳动群众的政治意识吗？绝对不是。相反，他们不想努力改变这个现实，他们像一群逛菜市场的闲人，寻找自己“满意”的革命，对于任何瑕疵和不足，他们都摆出那副看不起的嘴脸，一边给群众运动扣上莫名其妙的帽子，另一方面不进行实际工作以便未来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他们这样污蔑到：

“琼中事件并非革命而是一场自发的经济主义斗争。”

经济主义和“经济斗争”之间的差异，对于不学无术的人自然是不明了的。群众先从最接近生活的压迫入手转而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诉求，从经济性质的反抗到追求政治权利的过程，在他们这里成为了“经济主义”。我们想要提醒：经济主义是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工党里“经济派”的主张，他不是一群群众运动的类型，而指是“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

海南勇敢的农民群众大多都从未听过这个词，也绝非这种思潮的信条！请不要把左圈内斗里乱扣帽子的习惯用到群众头上。他们说：

“没有正确的政治纲领作为引导，他们行为的本质与冲塔无异，这对真正的革命来说不是有益而是有害。”

群众向政府和企业发动了攻击，因为各种原因失败了。他们就大脑升级得出这么一个啼笑皆非的结论：如果我们不一场运动直接建立社会主义政权，那运动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来，不仅是俄国1905年革命，就连二月革命，中国的1925，对他们来说就都是“弊大于利”的。他们看似懂得革命的不同阶段，但仍然不理解革命不是一蹴而就。马列毛大群给出的空头支票般的“计划”是这么说的：

“为未来的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提供物质基础。”

什么是“相持”？什么是“反攻”？要不是从中国官方教科书的抗日史里窃取灵感，要不是做白日梦幻想未来自己如何领导革命——他们可笑到尝试从水晶球里“预测”未来革命发展的过程。如此机械地制定蓝图，只会让人看不清脚下的道路。对于如何从“建设地下组织”过渡到所谓的相持和反攻阶段，他们完全给不出答案，也不可能给出答案。

他们拒绝战斗。他们想要全中国革命者都翻墙来看自己的TG频道，然后在“不可名状”的过程里就建立了一个“革命党”，在“禁止线下活动、禁止冲塔”的预设下群众也如同被脑控一样就突然支持自己。他们想要群众憋一辈子，直到马列毛大群的几个管理员拍案决定：现在有组织了！有纪律了！可以暴动了。不然，就会被他们称为“冲塔”。

革命的阶段是什么样的？它从来不该是我们用几个听起来十分“专业”的名词不加细化放出的一派胡言。革命的分子化进程，不是一条稳定上升的直线，而是在事件的动态发展中不断上下的曲线。我们将看的一个趋势，群众逐渐从经验中学习、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总结自己的教训。革命者在其中不旁观，也不可能通过自己主观意志改变方向；革命者像催化剂一样，用更系统化的理论帮助群众理解身边的世界，从生活、运动中得出革命的结论。革命者用自己持之以恒的立场和有力的组织能力（而不是单单开什么互助组织、送水或者法援），赢得群众的信任。

每一次自发斗争及其失败都在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同时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人民实际上没有罢工权和言论自由），所以经济斗争一开始就是直接挑战政府对

自由的限制，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斗争一开始就只能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出现，因此他们机械割裂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该为这些运动所能起到的提升阶级意识的作用表示支持，并指出要突破其局限性就得有社会主义意识，也就是有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去统筹自发斗争，让无产阶级被组织起来。

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给婴儿上早教课，只需要无脑地进行研究生教育。只懂得革命的最高纲领，却不懂如何将它转化为现实、如何考察现在的进程并制定合适的过渡纲领。在这里他们还犯下了方法上的严重错误：宗派主义。

可以说，马列毛大群的“宗派主义”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在革命队伍里构建自己的山头 and 某人之派，沉浸于内斗无法自拔；**

**二，是将劳动群众和革命队伍进行分离，让革命者成为脱离工人阶级的小团体。**

革命年代革命者最不能做的就是撒谎。真相有些时候不见得悦耳，但良药苦口利于病，如果只是跟在群众后头奉承，那不会推进事业哪怕半点。但目的为手段赋予正义，手段也为目的赋予正义：错误的方法不会让群众意识到不足，反而会培养一种傲慢，将人们推向自己的相反面。

大群虚伪地在自己的文章里这样说：

“列宁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就是组织，只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肩负起革命的重任。为此我们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地下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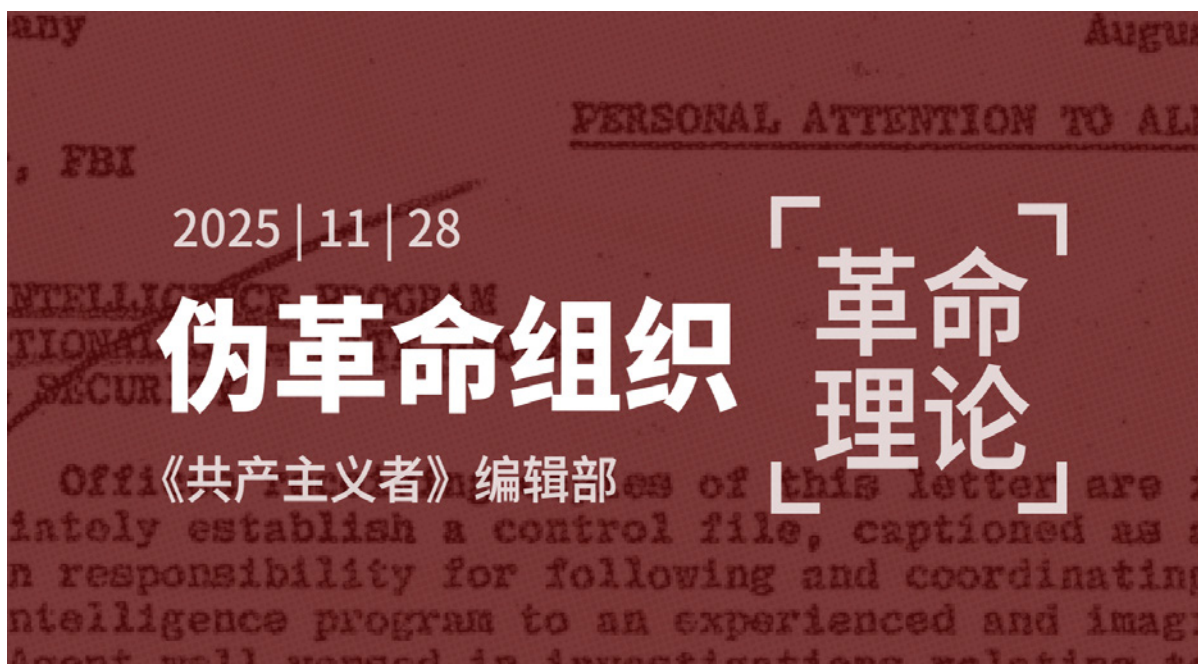
正在拒绝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宗派，何来的脸面引用列宁的言论？全国性的地下组织的建设，指的就是日复一日发布污蔑群众运动的时评、发动对其他组织歇斯底里的“干钧棒”、动不动喊喊“地下红军”吗？我们相信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中国的共产主义都意识到了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但难点不在于意识到，而在于落实。

革命政党的成长恰好是在一次次群众运动中成长的，中共就是最好的例子。妄想脱离群众运动“先”搞出来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地下组织“再”和群众进行接触，就是纯粹的幻想。停止那教师爷般的颐指气使吧！对于革命进一步推进更大的威胁不是“自发的群众”，恰好是这批站在路边嘲讽的闲人。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马列毛大群”在为谁的利益服务？

作者：韩麟



在外网中文互联网上，“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布站”或所谓“燎原”之流，表面上看是最大的左翼群聊，号称有两万多人，似乎是简体中文共产主义者的最大聚集地，但如果仔细考察，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真实体量不过百余人，其所谓的“高影响力”也只是为国内的“左翼”键政群体提供了一个外网平台。这个组织自称坚持列宁主义的政治报路线，以此为脚手架搭建全国一盘棋的革命组织，但其路线不断摇摆，理论越来越虚化，方向越来越迷茫。他们曾在2020年提出“代办员网络”，后来又改口为“基层群众互助组织”，幻想通过在政府末梢“夺权”来赢得群众威信。

这种思路不过是意大利共产党“结构性改革”的翻版，认为发点免费物资就能赢得群众信任，进而夺取基层政权。随后，他们又提出所谓“夺厂”理论，幻想占领工厂即可建立根据地。但是他们也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做到“夺厂”，于是他们的路线又发展到“黑帮夺厂”“黑社会路线”，最后演变成如今抽象的“地下红军”口号。如果我们想要提炼出一个明确的组织路线，我们得到的答案只能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路线”。他们的频道只是日复一日地发布“革命”的“八股文”，重

复资本主义坏、作为所谓“二流帝国主义”的中修坏、所以要建立“列宁主义政党”、要建立地下红军的空洞口号。他们没有什么有生命力的新思想，也没有实质性的目标。

那么造成这一切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组织过去因为需要搜罗证据，同时因为精力不足，没能及时进行说明，不过我们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我们现在的最新发现。我们发现，这个原因不在于他们认知上的错误，而在于他们的根本动机。大群起到的反动作用，不是因为理论不成熟，而是因为它现在已经是一个被中国警察所控制的组织了。这里我们没打算扣帽子，熟悉我们的读者也应该明白这一点，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们有了确凿的证据。这里我们要首先说明一点：我们说它被警察控制，不代表大群一开始就是警察设立的（因为它是被警察“夺权”了，警察在一步步打入、蚕食曾经的燎原后，现在已经彻底把大群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也不代表现在的燎原里面的所有成员都是警察自觉的合作者，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大群中确实有不少成员只是因为理论认知问题而追随大群，而且这些人也是无可辩驳的、有着真正的革命热情的人们。所以，我们也无意去猜测或者坐实大群管理层中到底哪位是警察的合作者或者里面潜伏着多少警察，因为这毫无意义，也不是我们的突破口。首先，燎原月刊每一刊最后都有一个如何“科学上网”的内容。那里面推荐的VPN有小牛VPN、小飞VPN、优途加速器等，然而这些VPN基本上都是完全不安全，而且也极有可能本来就是由警方运营或进行取证的服务器，而且其中小牛是做实的。还有就是大群推荐的软件内代理给的机场VPN的地址，如果我们往后查这些地址，就可以发现它们的背后都是中国运营商。虽说是否为中国提供商本身不是决定安全性的，但是他们所推荐的恰恰都是那些被公认不靠谱的。我们认为这已经足够起疑。



**中国公安对网络的监控**

此外，以前被大群盯上的很多团体，都不是理论上被打倒，就是突然“人间蒸发”了。大群还特意的声明这些事故和自己无关，我们认为这恰好反映了他们的心虚。比如，在去年带头“围攻”大群后被大群报复的东风和烈火学社、伐修社、致远星

编辑等组织，它们在“围攻”后仅一个月，要么是突然爆掉解散，要么就是tg频道删除、成员消失，他们很明显是遭遇了大规模的逮捕和渗透。除了上述内容外，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可以证明大群和中共微妙的关系。推特上有一个出名的、名为“梨老师”的账号（头像是一只猫）。该账号的运营者在2023年左右被抓，在其推特恢复更新后第一个推文就是声称是自由派媒体“李老师不是你老师”陷害了他，导致他入狱，随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抹黑各支反对中共的派别。之后“梨老师”的一系列言论都显而易见的与被捕前的风格完全不同，它甚至还有一些类似粉红的言论的推文，我们完全可以一眼就能看出这个账号已经换了人在运营，而账户运营者面对广泛的质疑还反复狡辩自己不是警察，这更加坐实了这个账号已经被中国警察控制。但是呢，就在2025年11月16号，这个账号开始莫名其妙地推送大群的TG链接，并且两天后发了一段支持大群的言论。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公认的、由警察控制的账号推荐的组织，也只能是警察控制的组织了。

那么，现在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马列毛大群为什么会被警察“夺权”？我们要明白，在一个革命组织中，如果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那么它的结构就会变成单纯的命令体系。少数人垄断决策，其他成员只能被动服从。这种组织形式表面上看似严密，但实际上极其脆弱。因为没有民主，党员无法在组织内部提出批评和监督，路线错误无法得到纠正，机会主义和独裁倾向会迅速蔓延。更严重的是，这样的组织极易被警察蚕食：只要警察渗透到领导层，就能轻易操控整个组织，而普通成员既没有渠道发现问题，也没有机制纠正错误。所谓的“集中”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反而成了中国的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最容易利用的漏洞。燎原实际上在理论体系上反对民主集中制，说什么“民主”就会让党内被“机会主义”所领导，而不是被“自觉的”同志领导。然而，事实上，什么叫做自觉，什么叫做机会主义，什么算坏人，都是这些“独裁者”自己进行定义的。正因如此，警察才能在燎原基层成员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向他们灌输中共能允许、限制革命者行动的思想。另外，燎原内部还是严禁线下结社的、严禁在身边发展出革命组织，只允许写作内核上没有任何创新的、其他毛左也一直创作的“老文章”。而这不恰好是警察乐意看到的吗？

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则恰好说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力量。沙皇俄国的警察曾经有成功打入过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阿泽夫，他是沙皇秘密警察“俄国保安局”的特务，并同时在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的圈子里活动。还有马林诺夫斯基，他甚至一度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和杜马议员。当时比较有意思的是，布哈林曾经觉察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行为，但列宁却不相信，列宁反而指责布哈林不信任党内同志，可见马林诺夫斯基的伪装功能之高深。十月革命成功后，马林诺夫斯基的身份暴露，被革命政府判处了死刑。这些沙俄警察确实进入了党内，甚至在组织中担任重要角色，然而，他们并没有能够摧毁并“取代”布尔什维克，原因就在于布尔什维克实行了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不仅要求党内充分讨论和批评，还规定只有能够实际开展工作的党员才能保持党籍。换句话说，党员资格不是靠口号，而是靠革命工作。即使是警察特务，如果要在党内长期存在，就必须参与革命工作，必须为组织出力。这样一来，特务在党内反而不得不为革命服务，无法轻易操控或瓦解组织。与此同时，党内的民主讨论和批评机制也让党员能够不断检验路线和领导，防止特务通过

操纵舆论来长期掌权；民主集中则保证了行动上的统一，使得即使有个别成员叛变，整个组织也不会瘫痪。正是这种制度，使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的高压统治下依然能够生存下来，并最终在革命高潮中发挥领导作用。没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警察只需控制领导层就能瓦解整个结构；而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即使警察打入其中，也只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实践要求下被迫为革命工作，无法蚕食整个党。所以，民主集中制一直以来都不能只是革命组织的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革命组织抵御国家机器渗透、保持战斗力的根本保障。

这里其实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统治阶级为什么会制造伪革命组织？这是因为，他们深知真正的革命力量一旦成长起来，就会直接威胁到现存的统治秩序。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和情报机关往往不会满足于单纯的镇压（因为这样做很多时候效率并不高），他们发现用渗透和伪装来消耗、分化和引导反抗力量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伪革命组织的作用就在于把群众的愤怒引导到安全的渠道里，让革命者在空洞的口号和无效活动中耗尽精力，而不是形成真正的斗争。通过制造这些组织，统治阶级既能监控潜在的反对者，又能在关键时刻挑起冒险主义或革命力量的内斗，使他们能够取证以“精准打击”，或是让革命力量自我瓦解。

历史上伪革命组织的出现并不少见，它们往往打着解放、革命的旗号，却在实践中成为特务机关、黑帮势力。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爱尔兰。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瓦解民族解放运动，扶植和渗透所谓的“革命团体”，这些组织表面上鼓动工人和农民反抗，但实际上由警察控制，成员的行动被严格限制在无害范围内。许多真诚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被吸引进去，却发现所有斗争都被消耗在空洞口号和无效活动中，最终为殖民统治服务。



### FBI “反情报计划” 下的黑人解放运动是伪革命组织的重灾区

在美国，冷战时期的 FBI “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更是伪装革命的经典案例。FBI 不仅渗透黑人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还扶植一些自称“极左”的组织，诱导青年走向无谓的暴力。表面上这些团体坚持激进口号，实际上却为国家机器提

供镇压的借口。许多黑人领袖和工人活动家因此遭到逮捕甚至暗杀，运动被严重分化。在亚非拉国家，类似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拉美一些自称“毛派”的武装组织，理论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武装斗争，但在实践中逐渐蜕变为地方黑帮，靠绑架、毒品和人口买卖维持生存。它们的存在不仅破坏了群众对革命的信任，还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污名化真正的革命者的证据。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伪革命组织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往往披着激进的口号，却在实践中完全脱离群众。它们强调绝对服从而缺乏民主讨论，成员不能监督领导，路线错误无法纠正。它们的理论多是“八股文”式的重复，没有积累和创新，所谓的“行动”则停留在空洞的键政或冒险主义。伪组织常常显得过度急迫，甚至要求新加入的成员立刻提供其隐私、人脉或金钱，或者反过来以“安全”为名禁止任何线下活动，使革命者停留在舒适区。

当然，一些组织虽然表现出与伪革命组织相似的特征，但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伪革命组织。比如，有的团体在极度高压的专制环境下，选择禁止线下活动，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一定是警察操控的“假旗”组织，而可能是出于现实安全考虑。这是因为，革命者在这类专制国家中常常面临严厉的监控和逮捕，线下结社的风险极高，因此部分组织选择暂时将工作局限在理论学习、宣传和线上交流，以保存力量。这种做法虽然容易让人误解为“只会键政”，但只要它们保持理论积累、坚持群众路线的方向，并在条件成熟时寻求突破，就仍然可能是真实的革命流派。因此，判断一个组织是否伪装，必须结合其长期实践和动机，而不能仅凭某一表面特征。另外，在互联网上，你无法直接确认一个组织是否真的有群众联系，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在高压环境下都会非常谨慎地处理安全问题，而不是让成员停留在虚拟的安慰中。真组织会强调保护成员、哪怕是联系人的安全，避免无谓的牺牲，又不会以“安全”为借口彻底否认展开一切斗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伪组织则可能不断怂恿无意义的危险行动，或者过度安全，在高压环境下却能长期公开存在。这些都是危险信号。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理论和实践宣传长期一致、规模小、不急于索取隐私和钱、提醒联系人不要暴露隐私的组织，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是一个真实的革命组织。

那么，如何判断呢？关键在于长期观察。真组织再小，也会在理论、出版物、学习小组、国际交流等方面留下逐步积累的痕迹，例如其出版物的质量逐渐提高，理论争论逐渐深入。它们会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目标，即使当前条件艰难，也能解释为什么要坚持、如何逐步积累。哪怕条件艰难，真组织也会尽其可能尝试建立学习小组、工人互助网络、地下出版物等。伪组织则往往停留在维持现状，没有这样的成长轨迹，几年下来几乎没有新的成果；它们只会重复口号，没有具体的战略路径。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资产阶级政府会常识经营一个看起来战略路线长期一致、并真正注意安全问题的小型革命组织，但是我们也得认识到，要长期、精细地经营一个“看似真实”的小组织（几十到几百人），需要大量人力、理论素养和长期投入，这样做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也不确定。对政府情报机关来说，这种投入通常只在出现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时才值得。例如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军国主义日本在上海扶植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由丁默邨、李士群等汉奸领导。这一机构表面上打着民族或政治旗号，内部却是日本特务的工具，专门用来渗透、瓦解和镇压抗日力量。它的经营是长期而精细的，因为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组织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日本才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来维持这样一个伪装的“革命”机构。



**由前中共党员李士群领导的特务机关驻扎在上海极司非尔路 76 号**

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做出以下呼吁：我们革命者必须认识到国家机器的监控能力极强，任何轻率的线下结社或暴露隐私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我们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谨慎：不要随意透露真实身份、联系方式或家庭信息，不要轻易信任任何陌生组织的、涉及安全与隐私的要求（包括我们共革阵）。其次，要保持技术上的警惕，避免使用不安全的工具和服务，尤其是那些可能直接被警方掌控的网络渠道。再次，要在思想和实践上保持独立，避免被伪革命组织引导到无谓的冒险或虚假的安慰中。真正的安全不是彻底躲避斗争，而是在斗争中保持理性和耐心，逐步积累力量，同时保护自己和同志。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谨慎前行，才能在高压环境下保存革命火种而不被轻易镇压。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论阶级社会中的科学研究

作者：韩麟



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极端的阴谋论思想，它认为所有科学研究的结论都是由资产阶级随意编造的，是为了欺骗普通人、维持统治而制造的“虚假知识”。

在这种观点看来，一切科学期刊、实验室、科学专家乃至整个科学体系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们合伙编造所谓的“科学事实”，让人们相信某些产品有益、某些理论正确，而实际上这些结论完全是虚假的，不可信的，单纯有利于资产阶级瞒骗人民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会说，除了自己亲眼见到的东西之外，任何所谓的“社会共识”都不可信，因为很可能会存在这么一种情况：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在合谋欺骗他一个人。

这种绝对阴谋论的立场，表面上看似能够保持个人在思想上的自由，也能让其不迷信权威，揭露资产阶级统治的反动实质，实际上却和会轻信所有人的人是一体两面的，这不过是在两个极端上。这种立场否认了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实践检验，把科学简化为政治宣传的延伸，结果只能导致怀疑主义和主观主义。

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观点的问题所在。统治阶级伪造科学结论的根本原因，在于维护其阶级利益的需要。科学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再生产和统治合法性紧密相连。现代统治阶级必须依靠利用科学来维持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利用科学话语来掩盖现实矛盾、延缓危机爆发、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科学一旦能够揭示出统治秩序的根本矛盾，能够威胁到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统治阶级就会主动压制、扭曲甚至伪造科学结论，以确保科学表面上维持中立和客观，实质上服务于统治需要。所以，统治阶级伪造科学并不是偶然的“学术不端”，而是其阶级立场的结果，是统治阶级在维护权力和财富时采取的策略。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便能够在短期内维持社会稳定和合法性。

但是，一切科学研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必须保证科学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符合实际，否则社会生产就无法不断的进行（而阶级统治的基础必须被不断再生产出来），阶级统治也会随之崩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桥梁的设计完全是虚假的，不能承重，那么桥梁就很容易坍塌，整个交通运输体系就会瘫痪，这也会让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显而易见的是，统治阶级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因为它会直接破坏他们赖以维持统治的经济基础。同样，如果药物的研究完全是虚假的，不能治病甚至危害健康，那么社会的医疗体系就会崩溃，群众的反抗情绪会迅速积累，阶级统治的秩序也会随之动摇。

可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社会生产的要求也是影响其客观性的重要要素之一。统治阶级完全可以影响科学研究的方向，可以在宣传上夸大某些成果，但他们无法随意编造科学结论，因为科学必须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否则整个社会生产就会停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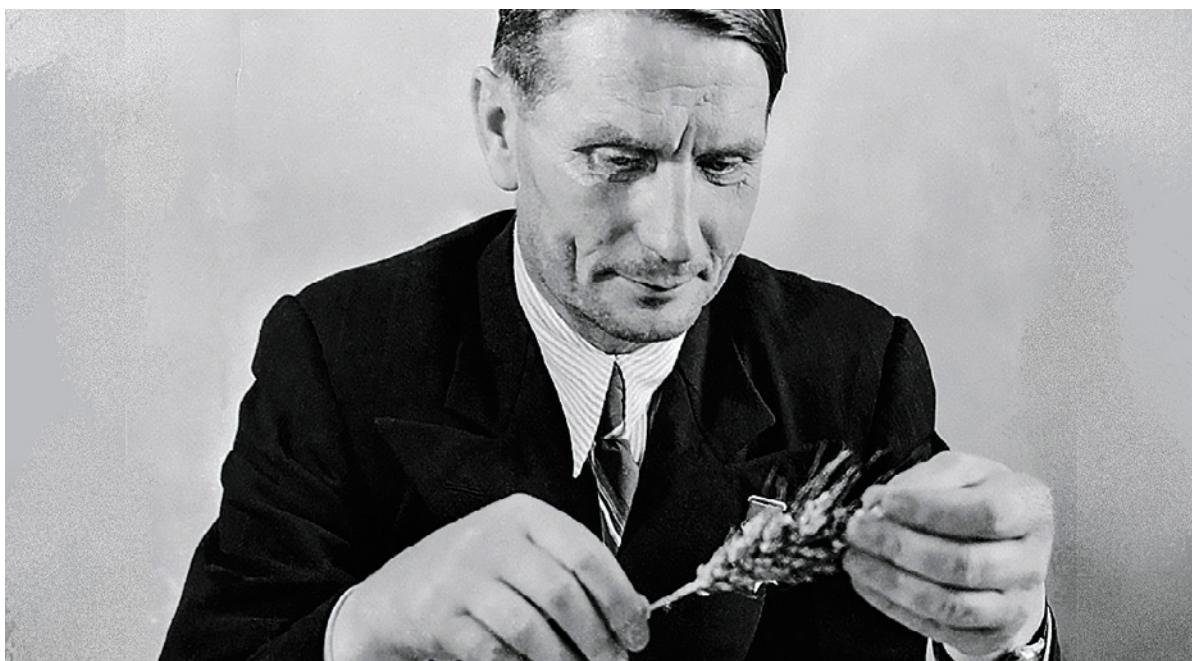


号称能快速清除污垢、保护皮肤的放射性浴盐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研究确实存在被操纵和扭曲的情况。例如在20世纪的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和企业曾大力宣传放射性物质的“安全性”，

甚至出现了放射性牙膏、放射性化妆品、放射性水等消费品。这些产品被包装成“现代科学的奇迹”，宣称能够强身健体、延缓衰老。实际上，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在当时已经有明确证据，但为了推动核工业和维持公众对核技术的信任，这些危险被刻意淡化甚至掩盖。更极端的例子是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之后，政府进行过大量秘密的人体实验，包括让士兵暴露在核试验现场，或者在医院中对病人进行放射性物质注射，以观察其影响。这些实验的实验参与者往往没有对实验的知情，更别说同意。

除了美国的例子外，现代中国的一些研究也曾经因为企业资金的介入而出现严重偏向。比如在营养学领域，食品企业会资助研究来突出自己产品的优势，甚至制造出“植物油比猪油更健康”的宣传口径。这种研究往往选择性地呈现数据，或者在统计方法上做文章，以达到有利于企业的结论。但问题在于，这类结论如果完全脱离实际，就会在长期实践中暴露。猪油之所以相比许多工业化加工的植物油更好，主要在于它成分天然、加工过程简单，含有一定比例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和脂溶性维生素，能提供稳定的能量和较好的烹饪耐热性。与之相对，大量精炼植物油往往经过化学处理，容易产生反式脂肪或氧化副产物，相比于猪油，植物油更容易导致心血管方面的相关疾病。因此，在适量使用的前提下，传统的猪油往往比高度加工的植物油更符合人体的实际需要。所以，企业可以通过广告和媒体影响一时的消费选择，但无法真正改变长期的社会实践结果。科学的客观性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



**特罗菲姆·丹尼索维奇·李森科**

除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阶段）也会存在“造假”的情况。苏联的李森科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李森科在农业遗传学领域提出了一套与主流科学相悖的理论，否认基因的作用，强调环境改造可以直接改变遗传特性。他的理论在政治上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成为官方的正统学说，其反对者则被打压，甚至因此遭到迫害。这种情况说明，政治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强行压制科学的客观性，把虚假的理论推到台前，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农业因此遭受严重损失，粮食生产受到影响，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李森科

主义的失败正好证明了科学结论不能由政治随意编造。政治可以暂时操纵科学，但因为人类在过去和目前都不可能改变自然规律，所以实践将让虚假的理论暴露它自己，而统治阶级也会为此付出代价。

从葛兰西的“被动革命”概念来看，这些例子也有其内在逻辑。统治阶级在面对社会矛盾时，往往通过有限的改革或话语调整来维持统治，而不是彻底的革命。在科学领域，统治阶级可能会利用某些理论来服务自己的利益，让自己能够在市场上打败其他企业，或者压制某些不利于政治体制本身的维系（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会如此）的研究。但他们同时又必须在实践中保留科学的客观性，否则社会就无法不断运转。科学在阶级社会中既被利用，又被迫保持一定的真实性，这就是“被动革命”的逻辑：统治阶级既要“操纵”科学以欺骗人民，又不得确保科学的客观性和实用性，以维持社会秩序和生产力的运转。科学的客观性正是在这种矛盾中被保留下来。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一个科学结论是否是客观的、可信的？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判断必然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困难是大多数人忙于工作和学习，没有时间去仔细阅读论文、分析数据，更不可能亲自重复实验。不过好在我们有其他办法。我们要判断科学研究是否客观，可以抓住几个简明的标准。第一，看研究是否经过同行评审和独立验证。虽然同行评审并不完美，但它至少提供了初步过滤机制。第二，看研究是否透明，是否公开方法和数据，是否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第三，看结论是否与长期实践相符，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印证。这样，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一个科学结论是否是客观的，并暂且相信它。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决定了伪造科学结论并非偶然，而是统治阶级维护私利的必然操作。企业和统治阶级会主动资助研究、操纵数据、制造偏向，以掩盖现实矛盾，延缓危机爆发。只要阶级结构继续存在，科学就会不断被利用来服务利润和统治。要根绝这种主动伪造科学的行为，必须进行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当科学从资本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生产力和知识财富，才能摆脱伪造和操纵。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民主制国家的建立也意味着科学研究的方向不再由利润决定，而是由社会整体的需要决定；科学结论不再被用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而是用来推动全社会的解放。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马列毛大群”工人工作路线的进化史： 从融工到“黑帮夺厂”到“地下红军”

作者：杨袭



革命者如何将自己的思想带入群众、领导起运动，往往是革命早期最困扰人的问题。在探索的过程中犯下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从实际出发，不断审查自己的成果并敢于创新，努力总能得到回报。相反，如果不看具体情况、牢守心中的成见，拿先入为主幻想出的“路线”命令式地限制发展，那撞破南墙“革命思想”也只是一小群宗派者的幻想。

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就是这样在脑海中构建了一条革命者通往群众的荒唐道路。现在他们叫这个路线“地下红军”，但如同某些小团体意识到融工的局限性、但不彻底摆脱束缚反而起个更好听的名字一样，“地下红军”不过是之前阶段拙劣思想的粉饰版本。追溯这帮人思想逐渐魔怔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说辞：“黑帮夺厂”。

这个路线是他们用来解释自己如何开展工人工作时提出的。在此之前他们也是融工的忠诚信徒，但在长期的徒劳尝试后，发觉到以外人的身份短期内提升工人的政治觉悟效果微乎其微。他们努力用理论说服工人支持革命，但总结经验得出：

“工人为了追随革命真理，为了谋求自身解放献身革命，确实如此，原则上是这样的。但原则上的正确绝不意味着具体实践中可以照搬，对于一个没系统了解过政治的工人来说，自由派的主张和马列毛主义的主张是没什么区别的，都是要造反；对一个读过一些书的工人来说，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没什么差异的，前者还要更动听一些；对一个没参与过路线斗争的泛左翼来说，手工业方式与先锋队是没什么矛盾的，完全是左派内斗，前者还要更实践一点。如果我们把这些事实摆出来的话，就可以发现，书本上的真理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觉得工人听了你的一番灌输就对组织死心塌地，那简直是狂人的呓语。”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从失败中得出了积极的新教训，这值得肯定：不看环境、场合、具体情况给工人群众讲奇奇怪怪的大道理，并不会让工人立刻决定奉献一切投身革命。这并不是因为群众“懦弱”或者“落后”，而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成年人如果要决定牺牲一切投身于事业，那他首先要看到成功的信心，要对路线有发自内心的认可。以老师身份给工人“灌输”革命思想的尝试古今中外数不胜数，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但当问到这个失败的根源时，马列毛大群却完全找错了敌人。他们认为，灌输给工人革命思想没有效果时因为“书本上的真理并不吸引人”。

尤其是从他们之前给出的例证中，我们也能看到马列毛大群写手们对劳动群众的蔑视。他们认为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智力是远超常人的，只有自己才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工人群众甚至都分辨不出来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不同！

事实上，书本上的真理如果由耐心、有能力的先进工人讲给自己的工友，那它不会是无聊、难以理解的。理论需要贴合现实，尤其是反映了工人群众每日思考的问题和社会舆论热点，能解答工人的疑惑，才能唤醒读者的热情。他们进行工人工作，如同很多马列毛小组一样感到不受待见，一直喜欢从工人身上找问题，而从来不去进行自我审视：自己“网左”的理论水平和漏洞百出的逻辑，加上不稳定的情绪、糟糕的人缘……工人如果真的因为这样的“灌输”认同了他们、加入队伍，那这个工人很明显是缺乏辨识能力的。在这里我举一下他们给工人讲的所谓“真理”的例子：

“资本主义太坏了。资产阶级剥削我们。工人只是牛马。中修压榨人民！”

工人回答：

“我知道，那我们怎么办呢？”

大群的“工人工作者”们：

“加入我们，先建立一个革命地下组织！”

工人更加疑惑：

“为什么？你在讲什么？什么样的组织？什么是地下？这怎么就能改变了？”

大群说，这工人不可救药。给他讲真理他还听不懂，不耐烦听，不敢于奉献加入我。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在工人面前就像一帮圣战分子一样狂热而没有头脑。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把自己那套莫名其妙的历史观不胜其烦地重复：你知道吗，文革是正确的，是伟大的，资本主义复辟都是邓小平这个走资派太坏了……然后想要分享自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给其他工人，让大家在每年毛泽东的诞辰和忌日一起聚一块哭一哭。

他们完全不懂得如何从工人的生活经验里入手，不是直接扔给群众结论，而是帮助群众汇总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他们不理解工人阶级最普遍的诉求是什么。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不是高举“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赢得群众的，而是“自由、和平、面包和土地”。但布尔什维克不是庸俗地给群众做出承诺，用“利益”劝说，他们是用真正的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死局和不幸的源泉，将普罗大众最重要的诉求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联系起来——这种有机的教育远不同于他们的灌输。他们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是悬崖，而不是桥梁。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 《共产党宣言》**

更不用说，真理不一定要通过外人灌输给工人，大群的学生暑假工们没有明白的是：你要让工人认可你的革命思想，你首先要让他们信任你这个人。我们这里绝对不是如同大群所批判地一样说“和工人交朋友就可以进行革命”，而是“你如果和工人群众都没有彼此信任，你就是突兀的外人，没有人会听你的胡言乱语。”工人工作需要由专业的工人组织者进行开展，由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进行领导，绝对不是工厂之外的“救世主”。

同时，要给予工人群众以信心进行反抗，那单纯的理论劝说肯定不够。讲理论有用吗？肯定有用，因为这帮助工人理解自己的经验。但工人群众首先要有那些经验才能接纳理论：换言之，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不从马克思的书本里学习，而是从一

场场的斗争、一次次的失败中学习，革命者提供给群众最浓缩和系统化的思想，但这思想首先要有生长的土壤。大群这时候由反过来反对工人工作了：他们说，一切工人阶级不直接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工人国家的运动，都是“经济主义”、“盲目冲塔”、“没有意义”……那他们既不希望工人从理论中学习，也拒绝让工人从运动中学习，他们希望工人怎么一步登天呢？

他们给出了这个可笑的说法：

“那么革命家组织究竟要靠什么来吸引工人？是力量，换句话说，是在正确路线的真理指引下展现出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下面几方面。一是组织架构上的严密，对群众来说，领导运动的组织越是神秘，越是无法打探，他们就对革命越是有信心，而与之相对的，为了遵循某种民主原则（或者干脆没能力保持秘密性）而近乎摆在明面上的手工业小组，就只会给人一种小孩子胡闹的感觉，要工人为这种组织犯政治风险，那完全是痴人说梦。”

原来是要让工人看到“力量”！具体这个力量是什么呢？他们说的十分模糊，但我们会尽量分析。他们给出的第一点“力量”来自于所谓“组织的神秘性”，在其看来，这个组织越无法打探，工人就越会支持他们。换句话说，工人群众越不了解一个组织，就越支持一个组织！我们在这里真的不知道大群的写手是否有作为人类基本的逻辑能力。但凡是工人能接触、了解的组织，工人在它们眼中就会判断这些组织是“胡闹”的，工人就会因为害怕蹲监狱而退缩。

首先我们质问这一点：如果只有神秘的团体才能让工人接纳，那古今中外一切公开的工人组织，包括那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怎么还能拥有工人群众的广大拥护呢？神秘主义是怎么能让劳动者对组织产生一种“信任”，当他们连认识都不认识？工人群众不会因为革命组织“无法打探”决定加入，事实上反而会因此对组织产生不信任、怀疑的态度。按照他们的逻辑，那中国工人阶级最该支持的组织，就是中国政府的顶层。

这种“组织拜物教”，或者说对于革命团体“神秘感”的莫名推崇，在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是特例。看似是和马列毛大群相对立的某知名托派国际组织的中国支部在这点思路上和他们的“敌人”是统一的。他们认为，自己只需要在世外桃源里建设那“干部队伍”，搞出所谓“秘密干部党”，等群众决心反抗那一刻，大家就会因为他们“理论好”而拥护其称为运动的领导者。他们从来不考虑如何构建革命者与群众的桥梁，甚至通过一套不能与党组织进行直接联系的“代办员制度”主动切断和境内的任何联系。

为什么公开的小组就会吓跑工人，而秘密的小组让工人反而敢加入呢？革命者选择公开或秘密的方法开展政治活动，自然是考虑到情景的不同。公开的场合，开展的是合法、安全的活动，秘密的场合，开展的是非法、危险的行动。如果他们认为秘密小组吓不跑仍然顾虑的工人，那我们只能推测：马列毛大群想要建立的这个“秘密组织”甚至连核心的政治思想都不谈，讲的都是合法的东西。

最后，我们也很疑惑马列毛大群是如何将革命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和革命组织的外围

群众结社的“秘密性”联系到一起的。民主集中制不会造成危险，泄密会造成危险。如果他们认为“组织的领导是谁、组织的结构是什么、组织的方向是什么、组织工作的进展如何”都属于“秘密”，那想要让人们认同自己、加入到队伍里，就成了寻找宗教般的“信徒”。

然后他们继续说：

“工人最缺的并不是兄弟情谊、金钱利益，无产阶级最大的痛苦就是其无权状态，革命家组织要带着工人夺权，工人因此不愿脱离组织。为此，一个替工人说话，说打就打的暴力值班小组，才是地上组织的核心，任何一个对运动现状有一些了解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一个暴力组织会得到群众的无限拥护（？），群众一旦看到我们成为了这样一种值得控诉、值得参与的力量，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参与进来，而先锋队就要成为这样的一种力量。”



### 神秘的“左翼”暴力团体在欧美国家十分流行

这段话几乎将我们上文提到的“圣战分子”的比喻做实了。这群口头嗜血的人，发现和工人交朋友、金钱收买、理论劝说各种方法都没有用后，便沦落成了一帮黑社会。在实践上他们肯定无法真的去建立起全国这么一帮“战斗轮班小组”，自己连枪都没有碰过的群友们只是从电视剧和文艺作品里学来了这种幼稚的对黑社会的浪漫崇拜。理论上这种方法更不会让群众因此支持革命，反而会恰恰疏远。

我举一个亲自面对面交流过的拉丁美洲工人的例子。这位工人对共产主义抱有极大的偏见，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杀戮、独裁和言论管制，支持右翼的反移民政策，哪怕这是针对自己的同胞。当我询问他原因时，这位工人问我：

“你七岁的时候，见过死人吗？不是自然死，是惨死的那种。”

我回答：我没有。他说，他的童年是在国家的内战中度过的。共产主义游击队那天

就在自己家楼下和警察交火，他亲眼看到共产党人和警察都有人中弹倒在血泊中绝望的死去。自此我就没有追问，因为我很清楚：一个孩子自然不能理解共产党人武装反抗的政治原因，他只知道共产党人带来了恐惧和不幸。恐怖主义，或者又组织的恐怖主义——黑帮结社，哪怕组织者是口号上宣称“为人民利益”的，但他们留给群众的印象从来不是解放者，而是混乱和无休止的暴力。

在蒲城运动之后，他们中的一些大空想家也公开发言说：如果当时我们在当地有一支地下红军，就可以把校长公开处死，那群众就拥护我们了。事实上，如果马列毛大群的某位群友杀死了校长，那首先群众会在恐慌中四散，随后政府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前来镇压运动、逮捕革命者。他们臆想的群众在自己的黑帮行为后拍手叫好，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恋。

群众不会因为你对他们的敌人用暴力的手段进行袭击因而支持革命，就像被刺杀的沙皇不仅没有瓦解制度，反而大大加强了镇压一样——列宁的长兄就因为这种路线的错误丢掉了性命。“说打就打”这种看似潇洒、帅气的思维，完全站在了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成为了发泄自己情绪的借口。工人阶级想要的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夺权”，而不是一群替代他们“夺权”的黑社会。“黑帮夺厂”路线完全把工人贬低成了肾上腺素的奴隶，他们认为只有用帮派暴力激发工人群众的愤怒，工人才懂得要进行革命。

事实上工人阶级最不缺的就是愤怒。即使是在现在的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也对现状感到不满，心中有无数苦衷但苦日子看不到头。大群以为在他们面前打倒几个“人民公敌”就能解决问题，难道不是跳回了自己的“盲目冲塔”吗？工人阶级缺乏的是基层独立的组织，这才是革命者真正的任务。

我们进行工人工作，就是以先进工人同志作为桥头堡，在地方党组织的协调下，建立工人的民主组织。我们要在一切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行动中作为最激进、最积极的分子出现，每时每刻都和工人阶级处于同一战壕里。我们帮助工人从经验中得出结论，用斗争的成果给予工人信心，展示出一个有力（指的不是大群那种“不透明”的）的革命组织，让他们相信共产党是为自己利益奋斗、也有能力真正领导自己得来解放的。只有最大胆、最奉献、最真诚、最有准备的革命者，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而马列毛大群的网络虚构黑帮，自然遭到普罗大众的唾弃！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针对没有翻墙渠道的读者们

**推荐 VPN：魔戒**

**国内直连官网（任选其一）：**

- <https://mojie.app>
- <http://mojie.host>
- <https://mojie.co>

**打开官网注册账号（邮箱注册，常用邮箱即可），登录后台，购买套餐（支持微信、支付宝）**

**邮箱推荐使用 Proton，其家的 VPN 也有安全保障：<https://proton.me/mail>**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http://bolshevikleninists.com)

Telegram (电报) 频道:

<https://t.me/revcommunist0cn>

电台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Instagram 账号:

<https://www.instagram.com/revcommunist0cn/>